

一九三〇年代中國城鄉問題的思想淵源 —所得全面低減說與所得分配不均說的爭議

李 宇 平

摘 要

本文試圖說明：1930年代中國經濟恐慌的發展，與城鄉之間財富增減的變動，桴鼓相應。當時的一種觀點以為，中國無論城鄉幾皆陷入恐慌蕭條的境地，城市收入與鄉間收入的全面低減，幾乎同時發生，中國經濟陷入全面蕭條與國際因素的衝擊，難脫干係；一種觀點則以為，三〇年代恐慌形成之初，城市所得與鄉間所得，有愈趨懸殊之勢，直到1934年底才共同趨減，城鄉之間經濟榮枯的變化，係分別受到國際與國內不同因素的影響。

本文又說明，三〇年代持通貨收縮為恐慌成因的貨幣論者持前一種觀點，他們認為：城市的興衰消長，與鄉村的興衰消長，大抵同時發生；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拓張」與「緊縮」的周期變動，桴鼓相應；中國經濟發生恐慌全然為世界經濟大恐慌衝擊之結果。他們強調貨幣此一全國性的要素，在聯繫全國經濟與國際經濟，以及統合國家經濟力量上所扮演的角色。他們以為白銀外流、通貨收縮致國際收支失衡，此一基本原因，不只為中國經濟由均衡關係走向不均衡關係的根源，並且在中國的匯價、物價與國際收支，隨世界銀價的變動而變動的同時，破壞了中國本身物價與成本的平衡關係，從而使蔓延於農村的經濟恐慌漸次走向城市。

本文又說明，三〇年代持貿易收支逆差為恐慌成因的貿易論者及馬克斯論者，持城鄉相剋說。他們認為中國之所以發生經濟恐慌，乃因中國的經濟

危機是生產不足危機，西方是生產過剩危機。正由於中國經濟危機是生產不足危機，西方的生產過剩危機乃得影響及於中國。世界經濟大恐慌對中國的影響，只及於農業商品化的地區。內地農村的衰敗，源自天災戰禍。他們強調貿易收支逆差致白銀外流，為中國經濟蕭條的主因，且以為導致此一貿易收支逆差的列強匯價傾銷，其特徵不只表現在中外雙方交易所建立的不等價交易上，且使城鄉之間的交易亦同樣具有不等價交易的特質。正由於發生於城鄉之間的農工產業交換條件的不同，乃使農民收入相對於城市的財富變動，愈趨不利。

一九三〇年代中國城鄉問題的思想淵源 —所得全面低減說與所得分配不均說的爭議

李 宇 平*

- 一、前 言
- 二、物價下跌的兩種觀察
- 三、白銀出超的兩種解釋
- 四、中國經濟與國際經濟關係的認知
- 五、城市經濟與鄉村經濟關係的認知
- 六、經濟危機說的形成
- 七、結 論

一、前 言

1930年代中國經濟恐慌的發展，與城鄉之間財富分配增減的變動，桴鼓相應。對於城市收入相對於農村所得的變動幅度，三〇年代的一種觀點持相成說，以為當時中國無論城鄉幾皆陷入恐慌蕭條的境地，城市收入與鄉間收入的全面低減，幾乎同時發生；另一種觀點則持相剋說，以為三〇年代恐慌形成之初，城市所得與鄉間所得，有愈趨懸殊之勢，直到1934年底才共同趨減。雙方對於農業部門與非農業部門收入下降的時間和幅度存有爭議，顯示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兩造對於經濟現象的觀察與詮釋不同。唯無論是持相成說或相剋說，大抵皆相信，從1931到1935年，農業的貿易條件趨於惡化，使農民所要購買的城市製造品價格下降較慢，而農產品價格首先下降且下降最快。^① 相對於三〇年代農民購買力的銳減，1920年代農產品和製造業之間的貿易條件十分有利於農產品，農民得到的價格比支付的價格上升得快，農民的收入與城市製造業部門同樣趨增，從而使得1920年代的中國經濟趨於好轉，儘管在1920年代，農民的生活條件和生活水平一直是十分落後的。^② 相較之下，三〇年代經濟蕭條期間農民購買力的急劇下降及農業貿易條件的不利，更凸顯了鄉村所得的低減以及城鄉財富分配問題的嚴重性，這或者正是三〇年代城鄉問題風起雲湧的由來。

中國經濟是在農村相對落後的情況下，加以同期間世界經濟大恐慌的衝擊，因而陷入全面蕭條的境地。對於世界經濟大恐慌對中國的衝擊，三〇年代朝野上下幾乎均有此共同之認識。^③ 依據當時的農村調查報告顯示，在恐慌發生以前的1920年代，中國農村經濟的困境主要在於土地匱乏、天災水患、技術落後、官吏貪贓枉法等，這些均與中國對外貿易較少關聯，與國際經濟的景氣或蕭條自亦無所關聯。不過，在三〇年代恐慌發生之後，由於列強對中國實施匯價管制與商品傾銷等，從而造成外貿市場蕭條、洋米輸入、白銀外流，並導致農村經濟的落後蕭條。因此，農村經濟的落後蕭條，可歸咎於對外貿易的緊縮，與國際經濟景氣的變動尤為相關。^④ 三〇年代中國經濟蕭條期間，論者之所以對外力入侵多所指責，不只是因為此一經濟蕭條承接於1920年代長期承平繁榮之後，其發生與世界經濟大恐慌的衝擊，息息相關。同時也是因為隨

① 張履鸞，〈江蘇武進物價之研究〉，《金陵學報》，卷3，期1（1933年5月），頁7-24；張心一，〈1933年中國農業經濟概況〉，《中行月刊》，卷8，號1-2（1934年1、2月），頁52-58；谷春帆，《銀價變遷與中國》（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頁119-120；123-125。

② Albert Feuerwerker, "Economic Trend,"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2: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3), pp.77.

③ 見李宇平，〈試析一九三〇年代中國的經濟恐慌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22，上冊（1982年6月），頁137-170。

④ David Faure, *The Rural Economy of Pre-liberation China: Trade Increase and Peasant Livelihood in Jiangsu and Guangdong, 1870-1937*. (Hong Kong: Oxford Univ. Press, 1989), p.203.

此蕭條造成的城鄉收入的劇減以及城鄉之間的財富重分配，形成於早期外貿興盛使各種所得有所提升之後，顯得更為凸出。三〇年代中國經濟陷於恐慌的說法甚囂塵上，其形成原因主要即在於朝野上下對上述農民所得變動方向與幅度的關切。而城市物價相對於農民所得的變動幅度，尤為論者關切的焦點。另方面，城鄉收入的低減，以及城鄉之間的財富重分配，亦正為中國經濟恐慌隨世界經濟大恐慌並轡而起之後積漸形成的現象。本文試圖說明，言論界對城鄉之間財富分配的反省，其實是中國經濟與國際經濟互動下的產物；當時人士對城鄉關係的認知，亦正是對中國經濟蕭條與世界經濟大恐慌之間是否具有關聯性的反省。

1930 年代中國經濟受到國際因素的衝擊，而陷入恐慌之際，城鄉財富是否同向變動？當時的一種觀點以為，城市收入與鄉村收入幾乎同時全面低減；另一種觀點則以為，三〇年代恐慌形成之初，城市所得與鄉間所得有愈趨懸殊之勢，直到 1934 年底才共同趨減。雙方對中國經濟恐慌的觀察不一，與其對恐慌成因的解釋息息相關。持所得全面低減說者，如顧季高以為「我國近四年（按：指 1931 ~ 1935 年）之通貨緊縮（按：指白銀外流），為經濟恐慌之根本原因」；持所得分配不均說者，如馬寅初則以為「入超為現銀外流之根本原因，……故言及中國之銀問題，結論必由銀問題轉入於國外貿易問題」。持所得全面低減說者強調貨幣數量的變動與經濟變動的全面相關性，可稱之為「貨幣論者」，主要的代表人物有顧季高、何廉、張素民、趙蘭坪、路易士 (Ardron B. Lewis)、張履鸞、陳長蘅等；持所得分配不均說者，強調中國經濟之陷入恐慌全然由貿易收支逆差所引發，認為經濟活動的變化先於貨幣數量的變化，可稱之為「非貨幣論者」，^⑤ 或可逕稱之為「貿易論者」，主要的代表人物有馬寅初、谷春帆、朱偰、吳大業、劉大鈞、賈士毅、金國寶、程紹德

⑤ 通貨收縮說與貿易收支逆差，為中國經濟恐慌成因的說法，分別見諸顧季高，〈中國新貨幣政策與國際經濟均衡〉，卓遵宏等編，《抗戰前貨幣史資料》(三)法幣政策（台北：國史館，1988年），頁411。馬寅初，〈我國銀幣位應放棄抑應維持〉，《銀行周報》，卷19，號22(1935年6月)，頁3。又如崔曉岑將當時人士有關恐慌救濟的言論分為兩派，一派主張從貿易上著手，其具體主張包括提倡國貨、提高關稅率、徵收匯兌傾銷稅、實行輸入限額制、補助輸出業、減免出口稅、與各國協商偶貨易貨等。另一派主張從改革幣制著手，其具體主張包括舉借外債、改金本位、禁銀出口、貶低銀幣價值、停止兌現實行紙幣管理政策、統制外匯等。見崔曉岑，〈四十年來之中國幣制問題〉，《經濟學季刊》，卷6，期4(1936年1月)，頁23-24。

等。

貨幣論者與貿易論者雙方意見的紛歧，幾可謂針鋒相對，分別表現在對物價下跌規模的觀察、白銀出超與貿易收支（或國際收支）間因果關係的詮釋上。本文首先說明，貨幣論者以為全國幾為白銀流通之域，因而認為因銀價上漲所致之物價下跌並無城鄉間的差異；貿易論者側重物價變動的國際性因素，以為內地離通商口岸愈遠之處，其物價愈難反映國際因素的變動，因而強調物價下跌在城鄉間的差異頗為顯著。貨幣論者之所以在物價與幣值呈反方向變動的認知上，發現物價的全面下跌，乃因他們以為白銀外流，而非貿易收支逆差為恐慌成因；貿易論者則以為貿易收支逆差，而非白銀外流為恐慌成因，故未曾根據幣值之變動而發現物價下跌的一致性。

其次，雙方對上述貨幣數量變動與經濟變動孰先孰後的爭議，也反映在兩造對於城市經濟與鄉村經濟，中國經濟與國際經濟間關係的不同認知上。貨幣論者以為白銀外流、通貨收縮致國際收支失衡，此一基本原因，不只為中國經濟由均衡關係走向不均衡的關係的根源，並且在中國匯價、物價與國際收支，隨世界銀價的變動而變動的同時，破壞了中國本身物價與成本的平衡關係，從而使蔓延於鄉村的恐慌，漸次走向城市；貿易論者以為導致中國貿易收支逆差的列強匯價傾銷，其特徵不只表現在中外雙方所建立的不等價交易上，且使城鄉之間的交易亦具不等價交易的特質。正由於發生於城鄉農工產業交換條件的不同，乃使農村收入相對於城市收入愈趨減少。

最後，在理論淵源上，貨幣論者根據自由經濟學派的國際均衡原理，強調貨幣此一全國性的要素，在聯繫全國經濟與國際經濟，以及貨幣在統合國家經濟力量上所扮演的角色，故不認為其間具有某一因素驅使城市與鄉村的財富變動方向愈趨背離。貿易論者則根據海耶克(F. A. Hayek) 物價變動可影響生產機制的理念，強調匯價變動影響進口物價，致使國內相對物價發生變動，為農工生產不均以及城鄉產銷失調的根源。

本文試圖說明，在上述數方面，雙方的不同觀點，似可反映其對城鄉關係的不同認知，此或可管窺三〇年代中國城鄉分配異同爭論之淵源。

又，馬克斯主義學者對物價下跌規模與原因的觀察，與貿易論者相同。雙方對中國經濟與國際經濟、城市經濟與村經濟的認知基礎相同，故予以並

列討論。僅在有關經濟危機說部分，雙方論點有明顯的紛歧，乃分開討論。為討論方便起見，茲據所查得的資料，將兩派論者列表於附錄，以為討論之基礎。

二、物價下跌的兩種觀察

本節首先說明貨幣論者與貿易論者對物價下跌的不同觀察。

1. 物價全面下跌說

貨幣論者以為物價與貨幣價值是一體之兩面。物價上漲表示貨幣價值的下落，物價下落代表貨幣價值的上升。貨幣論者因此以為 1931 年底（或 1932 年後）銀價之上揚，即表示中國物價已趨下跌。余捷瓊說：

「中國經濟事業之所以日就衰頹，物價之所以繼續下降，乃完全偶然因素作用之結果，為銀價突然之變化使然。」^⑥

路易士、張履鸞也認為銀價既然上漲，就表示中國白銀通貨區域物價的全面下跌。他說：

「中國物價的跌落，不僅限於與世界各國發生直接貿易關係之各通商口岸，全國凡屬貨幣根據白銀之地方，物價幾無不跌落也。」^⑦

又說：

「中國之經濟恐慌為中國貨幣價值增加之結果。中國為銀本位國，全國各地通貨既皆與白銀有一定關聯，銀值增高，批發物價，即逐漸跌落。且此種跌落趨勢遍及全國。」^⑧

他們同時指出，若以 1926 年之上海物價指數為 100，則 1931 年為 126.1，1935

⑥ 余捷瓊，〈中國物價基本趨向之研究〉，《經濟學季刊》，卷 6，號 3（1935 年 11 月），頁 122。

⑦ 路易士著，張履鸞譯，〈中國之經濟恐慌〉，第三篇〈白銀與中國之農售物價〉，《銀行周報》，卷 19，號 41（1935 年），頁 6。

⑧ 路易士、張履鸞，〈中國之經濟恐慌〉，第八篇〈貨幣價值變更之結果〉，《銀行周報》，卷 19，號 45（1935 年），頁 9；路易士、張履鸞又稱，華南有幾省幣制方面，比較複雜，當地通貨與銀元每無一定關聯，因此華南各地的物價，較之用銀元為通貨的其他區域，頗難一致。此外，各地皆銀元通行處，見第三篇，頁 5。

年8月即降至91.9。^⑨顯然，貨幣論者既強調貨幣數量為最重要之經濟因素，全國各地通貨既皆與白銀有關，白銀價值1932年後既已增漲，全國平均物價水準必然也一致下跌。

貨幣論者以為全國各地農產的平均物價變動是一致的，影響各通商口岸物價之因素與影響內地物價之因素，其間並無若何區別。路易士、張履鸞比較中央農業試驗所實業部《農情報告》上所刊載之各項農產物價變動趨勢發現，以米價為例，內地各省之價格變動趨勢與上海並無不同。他們說：

「依據中央農業試驗所所搜集之資料，江蘇、安徽、河南、湖北、四川、湖南、江西與浙江等地的米價，1931年1月至1933年10月，計平均跌落百分之四一，在同一時期上海的批發米價，跌落百分之四二。」^⑩再以小麥價格的跌落為例，他們認為華中與華北的變動頗為相似。他們說：

「如甘肅的小麥價格跌落百分之三五，陝西跌百分之三五，湖北跌百分之三五，安徽跌百分之三八，江蘇跌百分之三二，浙江跌百分之三七。惟山西省的小麥價格跌百分之五六，而四川省則僅跌百分之二五，此二省實為例外。」^⑪

他們又以通商口岸與內地的棉花價格變動為例，亦得到與米麥相同的結論。因1933年10月，10個農人所得的平均棉價較之1931年1月跌落百分之十一。上海1933年11月的批發棉價較之1931年1月亦跌百分之十三。^⑫顧季高則對上述現象做了進一步的推測。他除根據張心一所撰《1933年中國農業經濟概況》，同樣也是以實業部中央農業試驗所編製的《農情報告》為準。至於造成內地與通商口岸物價一致變動的因素，他以為如果農產品價格的跌落是全面性的，而非僅少數產品的變動，則此變動的原因是唯一的，且非商品面本身的供需變動使然，乃是貨幣面的因素造成的。他說：

「中國既非單獨農產品之跌價，而是全體農產品之跌價，則此跌價現象之形成，大體由於內地通貨收縮，吾人無法否認也。」^⑬

⑨ 同註⑧。

⑩ 同註⑦，頁5。

⑪ 同註⑩。

⑫ 路易士、張履鸞，前引文，第三篇〈白銀與中國之農售物價〉，頁5—6。

⑬ 顧季高，〈中國當前之貨幣改革問題〉，《東方雜誌》，卷31，號8（1934年4月），頁65。張心一文，見《中行月刊》，卷8，號1—2（1934年）。

可知，他們認為造成內地與口岸的物價變動，其因素是共通的，此即為貨幣價值的變動。

貨幣論者更推論此種物價變動的規模。根據財政部國定稅則委員會所編，包含各種物價（不限農產品）之上海躉售物價指數，以 1926 年為基期指數 100，則上海 1931 年 8 月物價指數為 130.3，1933 年 10 月為 96.1，因此，張履鸞與路易士認為此物價慘落的趨勢與包含的範圍，應「不僅限於上海與各口岸之一隅，而是遍及於全國各地。」¹⁴ 路易士、王廉也認為，各地物價，均逐漸下跌，即使就物品之不同種類及數量而言，各地物價變動之差，並無不同。他們說：

「1932、1933 及 1934 年之上半年，香港、廣州及中國其他各地之物價，均逐漸下跌。至於各地物價趨勢之差異，如就指數所含物品之不同種類及數量而論，則似不甚顯著。」¹⁵

可知，貨幣論者認為上海躉售物價指數既是包羅各項產品物價之批發指數，則物價的慘落，應僅有產業間跌落先後的區別，並無地域性跌落因素的不同。物價全面性的滑落，應是白銀所到之處的共同現象。

2. 物價下跌不均說

貿易論者側重中國的物價變動與其他各國間的比較，及物價變動的國際性因素，他們並不認為物價的變動可單純歸因於銀價的上揚。吳大業觀察金銀比價及英、美、法、日各國的物價變動，發現中國物價之升降，為各國物價與金銀比價升降之共同結果。他說：「吾人以為民國二十年以後，中國物價之降落，並非由於銀價之上漲，而實由於英、日、美等重要國家幣值之低跌。」¹⁶ 盛俊、李幹依據「國際聯合會」所出版 *World Production and Prices, 1925–1933* 一書，比較各國物價變動的趨勢之後有所發現。他說：

「民國十九及二十年美英日法四國物價一致繼續跌落之時期，而我國銀物價則反見漲。日本物價於二十一年回漲，英美於二十三年回漲，我國物價又僅於此三年繼續下落。……我國銀物價之跌落百分率，以二

¹⁴ 路易士、張履鸞，前引文，第二篇，〈白銀與中國之農售物價〉，頁 5。

¹⁵ 路易士、王廉，〈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國各地及香港之批發物價〉，*Economic Facts*, No.2(1936), p.98.

¹⁶ 吳大業，〈世界經濟衰落中之中國〉，《中國經濟研究》（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 年），上冊，頁 45。

十二年比十八年雖僅跌 7%，但比物價最高時期之二十年，則已跌 24% 之多。」^⑪

劉大鈞根據國定稅則委員會出版之《上海物價月報》〈匯價與銀價的統計〉，比較中、美、英、日的物價，發現「四國的物價，在合成銀元價值之後，有大略相同的趨勢」。^⑫

貿易論者既側重國際間物價的比較，不免略而不論上海此一國際金融中心之物價與全國各通商口岸間物價變動的差異性，而強調上海此一區域性物價對全國通商都市物價走向的代表性。劉大鈞的觀察，即是這樣的一個例子。他綜合各種調查報告資料，包括實業部《物價統計月刊》上載南京、青島、漢口三處之物價指數，南開大學〈華北批發物價指數〉，以及財政部國定稅則委員會出版之《貨價季刊》及《上海物價月報》等刊物的上海、廣州指數，最後得出結論說：「各地物價既有同情的漲落，故上海指數可說得能代表全國城市中物價的狀況。」他同時指出：「在二十年上海躉售物價指數達 126.7 的高峰，此後逐步下落，在今年（1934年）四、五兩月，已跌到九五以下。」^⑬顯然，貿易論者認為中國通商口岸間的物價變動是一致的。

既然通商口岸間物價的漲落具有一致性，通商口岸與國際物價之聯繫又極為密切，貿易論者基於此一觀察基礎，遂認識到「此期物價之跌落，乃由於國際的關係，非國內之原因」，^⑭故又強調內地各地離通商口岸愈遠之處，物價愈難反映國際因素之變動。例如：吳大業一方面雖承認同期間物價一致之跌落，但認為累計各年之跌幅後，仍可見內地物價反映國際因素者較少，受對外匯價波動的現象較不顯著。他說：

「最近物價的下跌，乃始於通商口岸而漸及於內地。……以今年五月的物價與民二十年平均相較，上海下降百分之十八，華北下降百分之十六，青島下降百分之十二，漢口下降百分之十一，南京下降百分之十。愈是通商口岸則

⑪ 盛俊、李幹，〈經濟恐慌發生前後之比較物價〉，《經濟學季刊》，卷 7，期 2（1936 年 8 月），頁 30。

⑫ 劉大鈞，〈近八年我國物價的研究〉，《東方雜誌》，卷 31，號 16（1934 年 8 月），頁 17。

⑬ 同上，頁 6。

⑭ 吳大業，〈世界經濟衰落中之中國〉，《中國經濟研究》，頁 48。

物價下降愈甚，經濟狀況愈與內地的情形接近，則物價下降愈少。」^①總之，貨幣論者既強調貨幣數量與物價下跌之關聯，故強調貨幣與經濟變動的直接相關性。貿易論者因不認為內地與外埠受同一因素、同比例、同方向變動的影響，故反對貨幣數量對經濟活動的優先性影響力。此可由下文他們對與物價變動息息相關的白銀出超的若干觀察得知。

三、白銀出超的兩種解釋

白銀為中國主要貨幣，需要數量龐大，加以國內產量有限，需仰賴海外輸入，故迭有入超。據海關進出口統計，自 1890 年至 1936 年的四十七年間，銀之入超為 466,401,000 關兩，平均每年入超 9,923,000 關兩。^② 正由於白銀入超司空見慣，1932 年白銀流動由入超轉變為出超，遂為眾所矚目。據谷春帆估計 1931 年以前之現銀淨進口額如下：1928 年進口 159,600 萬元，1929 年進口 158,700 萬元，1930 年進口 100,500 萬元，1931 年進口減至 7,700 萬。自此以後，白銀淨出超額，由 1932 年的 1040 萬元，增至 1933 年的 1440 萬元，再增至 1934 年的 20000 萬 6 千元。^③ 余捷瓊、顧季高也發現 1932 年為白銀流動方向轉變的關鍵年。余捷瓊認為自 1700—1931 年白銀流動皆呈淨入超之勢。自 1932 年—1937 年白銀流動則呈淨出超之勢，1888—1931 年白銀淨入超總額為 1,323,598,006 元，而 1932—1937 年六年間白銀淨輸出額即達 990,106,068 元。^④ 顧季高估計，全國現銀對外輸出入之狀況，1929 年對外入超額 169,322,000 元，1930 年對外入超額 107,209,000 元，1931 年對外入超額 72,712,000 元，而 1932 年以後則轉為出

① 吳大業，〈附答顧翊群君關於《提高銀價與中國銀貨外流之討論》〉，《中國經濟研究》，下冊，頁 743。

② Yu-kuei Cheng, *Foreign Trad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China: An Historical and Integrated Analysis through 1948* (Washington:the University Press of Washington D.C., 1956), p.99, pp.258-9. 又見石毓黻，〈中國貨幣金融史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頁 258。

③ 谷春帆，〈銀價問題與中國〉（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年），頁 85。

④ 余捷瓊，〈1700—1937 年中國銀貨輸出入的一個統計〉（長沙：商務印書館，1940 年），頁 36。

超，當年的對外出超額有 11,753,000 元，1933 年對外出超額則增至 14,113,000 元。²⁵ 雖然各人對白銀入出超總額之估計數字略有出入，但 1932 年後白銀輸出之激增，顯為不爭之事實。

1932 年中國突然成為白銀淨出口國的同時，貿易逆差額卻有減少之趨勢。對於貿易入超減少與白銀輸出擴大間同時的發展，三〇年代學者亦多所措意，持貿易論的李立俠即稱在白銀流動由入超轉為出超，且其出超額由 1933 年 141,544 元增至 1934 年的 256,728 元的同時，貿易入超之趨減，由 1931 年入超額的 733,619,128 元，1932 年入超額 867,190,964 元，1933 年入超額的 733,739,198 元，劇減為 1934 年入超額的 194,450,945 元，再減至 1935 年入超額的 343,402,265 元。²⁶ 持貨幣論的路易士、張履鸞亦曾言及「在 1932 年以前，每年白銀多係淨輸入，然而在同一時期進口貨值卻係年年超過出口貨值。自 1932 年起，貨值之入超雖漸減，而白銀反倒變為淨輸出了。」²⁷ 就一般而言，貿易入超必須以同額之現銀運出以為抵補，是則中國即應於五年內（1931—1935 年）運出 31 億元銀幣為抵補貿易入超之用，然則同期間白銀出超僅有二萬二千萬元。²⁸ 白銀流入與貿易收支逆差之平衡是否具有絕對關聯，乃成判定貨幣數量與經濟變動的因果關係之焦點。

在白銀流動由入超轉為出超，貿易逆差趨減的 1932 年，中國國際收支首見入不敷出。²⁹ 儘管三〇年代學者莫不肯定國際收支不足與現銀出超之間具有某種程度的相關性，唯對其間孰者為因，孰者為果之因果關係，在認知上仍存有極大的歧異。貿易論者認為現銀之流出，在抵補國際收支之虧損。對於 1932 年以後貿易輸入額不見增加，輸出額漸形減少之後，白銀仍有流出的現象，他們強調這絕對是貿易收支不能相抵致國際收支惡化的結果，如谷春帆以為，「自

²⁵ 顧季高，〈中國當前之貨幣改革問題〉，《東方雜誌》，卷 31，號 8（1934 年 4 月 16 日），頁 63。

²⁶ 李立俠，〈中國國際收支平衡之研究〉，《實業部月刊》，卷 1，期 6（1936 年 9 月），頁 5。

²⁷ 路易士、張履鸞，〈中國之經濟恐慌〉，第六篇〈物價跌落與中國之國際貿易〉，《銀行周報》，卷 19，號 43（1935 年），頁 19。

²⁸ 李立俠，〈中國國際收支平衡之研究〉，《實業部月刊》，卷 1，期 6（1936 年 9 月），頁 3—4。

²⁹ Yu-kuei Cheng, op.cit., pp.261.

1932年起，中國之國際收支，始見入不敷出，不得不輸出現銀為最後之清償，……。大勢所趨，估計收支有餘之年，現銀入超。收支不足之年現銀出超。此種趨勢，甚為明顯。」^⑩ 吳大業亦認為，1932年與1933年對外貿易入超雖已減退，但數額仍鉅；且因歷年輸出減少，國內經濟又進入經濟衰落之時期，對於銀貨的需要減少，於是已往數年集中於上海之銀貨，陸續輸出國外。^⑪ 正由於重視貿易收支逆差在破壞白銀出入超平衡上的作用，馬寅初稱是貿易問題，而非銀問題，為中國經濟恐慌的最終成因，他說：「欲保國內現銀，惟有使國際貿易得其平衡，解決入超。蓋入超發現銀外流之根本原因。阻止現銀外流，當對此根本原因設法。……故言及中國之銀問題，結論必由銀問題轉入於國外貿易問題。」^⑫

相對於貿易論者強調貿易收支逆差為因、白銀出超為果，貨幣論者則持相反的意見。他們認為白銀外流為因，國際收支失衡為果，且以為貿易收支逆差之擴大與白銀的流出流入並無固定關聯。顧季高指出，在1928年到1931年間，貿易入超雖逐年加大，現銀仍年有進口，此乃由於中國幣值下跌，外人及華僑紛來投資，白銀大量進口，故國際收支未嘗不敷。但1931年後，英、美、日相繼貶低幣值，中國對外匯價上漲，外人及華僑投資不利，紛紛將現款提往他處，現銀大批出口，國際收支遂趨向入不敷出。^⑬ 路易士、張履鸞亦指出，「在1932年以前，每年白銀多係淨輸入，然而在同一時期，進口貨值卻係年年超過出口貨值，自1932年起，貨值之入超雖漸減，而白銀反倒變為淨輸出了。」他們認為貿易支付之逆差，並非中國白銀淨輸出之原因，但白銀大量外流，卻導致國際收支之逆差。^⑭

貨幣論者強調銀價漲跌與白銀流出入間的關係，顯示他們認為白銀的淨

⑩ 谷春帆，前引書，頁85。

⑪ 吳大業，〈世界經濟衰落中之中國〉，《中國經濟研究》（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年），上冊，頁50–52。

⑫ 馬寅初，〈我國銀本位應放棄抑應維持〉，《銀行周報》，卷19，號22（1935年6月），頁13。

⑬ 顧季高，〈入超果於中國有大害否〉，《社會經濟月報》，卷2，期5（1935年5月），頁20。

⑭ 路易士、張履鸞，〈中國之經濟恐慌〉，第六篇〈物價跌落與中國之國際貿易〉，《銀行周報》，卷19，號43（1935年），頁19。

收入或淨支出係決定於中外間銀購買力之差。何廉認為 1932 年後國外金賤銀貴，以金計算的銀價在中國之上，是白銀外流的主因。他說：

「世界銀價之下跌，吾國往往後於國外。國外銀價先跌，因之國外銀購買力恆較中國之銀購買力為低，故自 1921 年銀價日趨下跌以來，中國白銀進口年有增加。……提高銀價之聲浪起，致國外以金計算的銀價，乃在中國國內以上，遂造成一國外金賤銀貴，中國金貴銀賤的現象。……故 1932 年及 1933 年中國全國銀貨出超共達三千萬元之鉅。」^⑮

白銀之出入超由中外間銀購買力之差所決定，顯示一個重要的現象：中外銀價差距的擴大，可以決定白銀流通方向的轉變。因此國外銀值高漲，尤其是各國貶低幣值後，中國對外匯價之高低與國內白銀存量間具有相當程度的關聯。由此亦顯示，貨幣論者意識到因國內外銀價之差而產生的投機獲利心理，在國內白銀存量增減上具有直接的影響力。路易士、張履鸞曾提及 1932 年前後銀價的明顯漲落，鼓動了投機殖利心理，影響貨幣保有動機，從而造成白銀流通方向的改變，使國內存銀大量流向國外。他們說：

「在 1931 年，中國物價，恆繼續上升，企業情形亦比較良好。在此時期中，每年恆有白銀之淨輸入。……1932 年以後，銀價開始高漲，此種基本情形，完全相反。……銀值增加，可反映出物價之跌落，而反於債款、薪資、稅額，及其他固定用途，並不覺其增值。……故在物價開始低落時期，在中國存貯白銀，殊不合算。此所以 1932、33 及 34 數年中，銀值增，在中國即變為一白銀淨輸出之國家也。」^⑯

貨幣論者更進一步指出，白銀的大量外流，除意味著貨幣存量的縮減之外，同時也造成內地現銀大批流向上海，形成城鄉間白銀存量分配失衡的現象。1932 年前國外白銀之向中國輸入，自然地造成上海白銀向內地流通，1932 年後，現銀向國外輸出，自然的形成內地現銀大批流入上海的趨勢。至於 1932 年後內地存銀漸少，上海存銀特別增加，此一特殊現象之所以形成，路易士、張履鸞以為是：1932 年前，中國物價尚在繼續增漲中，內地白銀，雖有多數輸

^⑮ 何廉，〈銀價問題與中國〉，《獨立評論》，號 92（1934 年 3 月），頁 2。

^⑯ 路易士、張履鸞，〈中國之經濟恐慌〉，第七篇〈白銀價值之增減對於中國國內外白銀流動之關係〉，《銀行周報》，卷 19，號 44（1935 年）頁 3。

往上海，但同時從上海輸入內地者數量更多，但自物價跌落後，自內地輸往上海之銀量，雖較以前無甚變動，但從上海輸往內地之白銀，則幾乎停止。^⑯ 1932年後內地對上海收支呈現入不敷出的現象，已有愈演愈烈之勢。

內地對上海收支清算不利，上海存銀增多，此一事實同時說明，距離都市較遠區域，每將現金集中於工商業中心。貨幣論者認為此為物價低落、存銀外流時之自然現象。路易士、張履鸞指出此一現金流向都市之現象，乃隨時間推移，漸次由內地農村走向工商業中心，再走向沿海的通商大埠。他們以為工商業中心為內地借貸來源，工商業中心所持債權持續增加，是白銀漸次向通商大埠推移，卻不再向內地移動的原因，他們說：

「農售物價，每跌較速，而工商業中心製造品之價格，則跌落較慢，且此等商業中心區域，每為內地工商業借貸之源。內地工商業不振，償款為難，所有者自將僅有債務，則商業中心區域之工商界，對於內地投資自當格外謹慎，對於收集以前內地之債務，使之變為現金，亦自當格外努力矣。」^⑰

可知，物價下跌趨勢固然同時發生，但各區域間物價變動仍有先後之不同。

對貨幣論者所持中外間銀購買力之差，決定白銀流通動向之演變的論點，貿易論者不否認白銀的淨收入或淨支出，就長期趨勢觀察，中外銀價之差具絕對的影響力，而白銀出入超的轉變與貿易收支順逆間因果互動的關係，僅係短期因素作用的表現。如吳大業說：

「銀子流動的原因與其他貨物並沒有區別。中國每兩銀子的價值高於國外，則銀子必將輸入中國；反之，中國的銀子賤於國外，則銀子必將輸出國外。」^⑱

貿易論者既認定貿易收支逆差導致白銀外流，何以仍接受中外間銀購買力之差為白銀流通方向轉變之決定因素的說法？此無疑是認定對外匯率的變動與貿易收支逆差息息相關。由於匯率變動會影響進出口物價，而後影響國內物價，持貿易論的谷春帆因而認為，「匯率變遷之第一名犧牲者即為物價，且無論匯

⑯ 路易士、張履鸞，〈中國之經濟恐慌〉，第七篇〈白銀價值之增減對於中國國內外白銀流動之關係〉，《銀行周報》，卷 19，號 44（1935 年），頁 4—5。

⑰ 同上註，頁 5。

⑱ 吳大業，〈中國銀貨進出口的解釋〉，《中國經濟研究》，下冊，頁 746—7。

率之變遷係由於長期或短期之原因，或由於銀價之升降，總是如此。」^⑩他主張各國貶低幣值，美國提高銀價，乃促成中國發生經濟恐慌的原因，正是由於匯價變動影響物價變動，導致貿易收支發生變動，國際收支平衡亦隨之變動，現銀從而流入出。

貿易論者既認為中國經濟恐慌之形成是匯價、物價的變化先於通貨的變化，論及白銀出口的原因，吳大業遂以為是由於國內物價跌落，故經濟衰落，資金無用，最後乃有銀貨之出口。他說：

「二十一年（1932年）以後，對外貿易入超雖見減退，但中國已入於經濟衰落之時期，對於銀貨之需要減少，於是已往數年集中於上海之銀貨乃感過剩之現象，而陸續輸出於國外；自各國有提高銀價之議後，流出之數量更巨。」^⑪

論及內地白銀之大量流向通商口岸，吳大業遂稱是「現在內地銀貨的繼續流至通商口岸，仍為出口不振，不能以土貨易外貨，而僅能輸銀之故」。^⑫可見貿易論者以為，內地白銀流向通商口岸與白銀大量流往國外一樣，是因為經濟蕭條的結果。他們認為是經濟活動之遲滯，造成城鄉白銀分配比例的變化。

總上所述，對於1932年後內地白銀流向城市，上海存銀增多並大量外流，及同期間出現的白銀出超現象，貿易論者以為，根本原因在貿易收支之逆差，故可推究於匯價變遷對中國進出口物價及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本文第二節中討論貿易論者對於物價變動趨勢的觀察，其重視國內外物價變動之差異及國際因素對國內物價的影響，由此亦可概見。貨幣論則以為銀匯隨銀價提高而影響輸出入物價，再影響國內的全盤物價，雖為國內物價低落的一個因子。但更重要的因子為銀價變動，現銀流出，影響國內的購買力，再影響於物價。這正說明，相對於貿易論者之強調貿易收支的作用，貨幣論者則以為，1932年後中國經濟之所以陷於蕭條，乃貨幣存量變化的結果。

^⑩ 谷春帆，《銀價變遷與中國》，頁25。

^⑪ 吳大業，〈世界經濟衰落中之中國〉，《中國經濟研究》（上冊），頁50。

^⑫ 吳大業，〈中國銀貨進出口的解釋〉，《中國經濟研究》，（下冊），頁746—747。

四、中國經濟與國際經濟關係的認知

1.不平等說

誠如上文所述，貿易論者以為國際經濟間的關係，係以匯率作用開其端。他們認為各國貶低幣值，抬高銀價，其目的或在貶低本國幣值，使本國對外匯率降低；或在抬高他國貨幣價值，使他國購買力增強，凡此皆係有鑑於貨幣貶值及匯價跌落可資進行商品傾銷。就拓展對外經濟關係而言，具有突破他國關稅壁壘、搶奪商場，轉入超為出超的功效。三〇年代銀價高漲為國際通貨戰爭的產物，銀價提高對於中國之弊害，不僅可能製造外國傾銷之機會，抑且可能演成為通貨緊縮的危機。^⑬ 貿易論者多半側重匯價變動之害，而不強調通貨外流的危機，即是基於此種考慮。因此，貿易論者多強調匯價傾銷與中國貿易入超所具有的直接關聯性。如朱偰說：「運用匯價傾銷愈烈之國家，其輸出愈增，而吾國所遭之入超亦愈鉅。」他並以英、美、日三國為例，進一步指出，三國之中以美國匯價傾銷最成功，故美國對華貿易入超值遠遠超過其他各國。^⑭ 谷春帆也同意此一說法，認為「與其直接以銀價上下為貿易加減之原因，不如以匯價為妥」。^⑮ 他們既認知匯率的改變會帶來進出口商品價格的改變，並影響進出口貿易總量的變化。可知，貿易論者認為貿易收支會隨匯率而發生巨大變動。

由於西方國家實施匯價傾銷，以提高中國之對外匯率，會造成中國以外幣表示的出口單價的上漲，而以外幣表示的進口單價未見跌落，致中國對外貿易趨向不利。貿易論者以為中國對外貿易收支之順逆會隨匯價變動而轉移，正說明國際貿易對中國產生的不利影響，係建立在中外雙方不等價交換的基礎上，且此不等價交換的基礎，有明顯趨於擴大的跡象，致使中國對外貿易條件逐漸趨向不利。那就是剪刀差的擴大，進口物價的相對下跌，同時引起

^⑬ 朱偰，〈世界通貨戰爭之現階段及中國應取之對策〉，《東方雜誌》，卷 32，號 13（1935年 7月 1日），頁 32-3。

^⑭ 朱偰，〈銀價變動之趨勢與中國之對策〉，《東方雜誌》，卷 31，號 10（1934年 5月 16日），頁 42。又見，朱偰，〈徵銀出口稅係補救入超之對策——制止匯價傾銷稅〉，《東方雜誌》，卷 31，號 23（1934年 12月），頁 8。

^⑮ 谷春帆，〈銀價變遷與中國〉，頁 29。

進口總額的上升。谷春帆即對此發出不平之鳴。他以為，就表示進口物價與出口物價之關係的淨貿易率（barter trade of terms）言之，銀價上漲所造成之1932年、1933年及1934年進口物價之跌落，乃屬幻象。蓋進口物價雖然跌落，同時出口物價跌落更劇，進口貨最後終須以出口貨抵付，中國之淨貿易率繼續不利。另就代表進口物量與出口物量關係之總貿易率（gross barter terms of trade）言之，谷氏以為，1930年代最初數年，中國進口貨物數量雖有減少，而出口貨物數量則減少更多，以致就中國國際貿易之總貿易率言之，非但顯示中國出口貨不能相形增加，反表示進口貨之相形增加。^⑯ 不利，然總貿易率未隨之調整，遂使入超數額，幾於年年有之。中國在國際貿易關係中所處的地位，乃趨於劣勢。

由於國際經濟間的交換行為多發生於工業國家與農業國家之間，且多以不利於農業國家的方式進行，貿易論者因而強調中國對外貿易入超與日俱增，部分原因，是工農產品生產價格不平等交易的反映。而這正是他們所強調中國與其他國家財貨交易的本質，馬寅初曾說：

「中國與外國國際間貿易是平等的，互惠的，而中國與外國國際間貿易是不平等的，中國吃虧的。追根究底，則因為吾國無工業品出口，而是以粗笨價廉之原料，換人家精巧價貴之熟品，所以是吃虧的。」^⑰

三〇年代世界經濟大恐慌期間，中國對外關係表現的不等價交易本質，不只說明先進發展國家與低度發展國家之間的關係是國際生產分工的產物，同時說明低度發展國家與先進國家間的價值與財貨流動，其主要目的在方便先進國家拓展國外市場，為其經濟體系內的剩餘商品找到一個出口，以避免危機的持續。此其所以世界經濟恐慌發生以後，產業先進國家以農業生產過剩為其恐慌之特徵，而這種過剩的農產物又不免以發展落後的中國為傾銷的尾閭。貿易論者以為最足表現先進國家危機轉嫁之特徵者，莫過於大量糧食之對華傾銷。而中國之所以陷入經濟危機者，則是因為中國國內市場已成各國剩餘商品的出路。朱偰、馬寅初均曾提及大量糧食傾銷中國，是以農立國

^⑯ 谷春帆，前引書，頁57-62。

^⑰ 馬寅初，〈世界經濟恐慌如何影響及於中國與中國之對策〉，《東方雜誌》，卷32，號13（1935年7月），頁11-12。

的中國對外貿易日趨惡化的重要原因。如馬寅初稱：

「外國不景氣的特徵乃生產過剩，不僅中國所有工業產品，日用所資均係洋貨，乃盡人皆知，即洋米、洋麥、洋棉、糖、海產此類農產品也均入口甚多。」⁴⁸

朱偰亦稱：

「夫以農立國之國家，而食糧猶仰給外國，既無工業輸出以抵補，又無大量農產品輸出以爲挽回，則入超日趨嚴重，自屬意料中事。」⁴⁹

另據王伯顏的觀察，中國對外貿易危機的特徵之一即是「糧食進口的激增」。他以為1933年後進口的商品中，農產品居多，生產品總值減少，這才是中國經濟真正的危機。⁵⁰此一危機的形成，乃由於先進國家擴大輸出，使中國市場充斥著進口的農產物。其價格的低廉，不僅使中國農產物的價格大幅滑落遠低於成本，且使得中國的農產物留存於原產地，不能運銷於市場。⁵¹西方的經濟恐慌以農業過剩而出現於中國，因此中國所面臨的經濟危機不只是國內經濟的不能開發，而且是國內市場的被奪。

國內市場的被奪，也正是中國生產不足的表徵。外國不景氣是生產過剩，中國不景氣是生產不足。由於中國生產不足，所以洋貨趁虛而入，世界經濟大恐慌乃得影響及於中國。馬寅初曾指出上述中外經濟情形之不同，利於世界經濟恐慌向落後的中國傳播。他並指出中國生產不足，「使洋貨入口，而土貨不能出口，土貨不能出口，以至於紗、絲、布不惟少出，反而輸入，其他日用消費品，洋貨尤多，於是本應以土貨交換洋貨者，至是乃祇有洋貨入內地，土貨不出，祇有內地錢出來到了都市。」⁵²與馬寅初之中國生產不足、土貨不能出口的論點互相呼應的是，朱偰的農產歉收，外貿萎縮的觀點。朱偰指出，儘管進口貿易在1934年後有減少之勢，卻並不一定表示國內市場上國貨有抑制舶來品的能力，因為進口貿易值方面的減少，並非爲量的方面的減少，且對

⁴⁸ 馬寅初，前引文，頁11。

⁴⁹ 朱偰，〈農業保護關稅問題——洋米進口稅率的研究〉，《東方雜誌》，卷31，號9（1934年5月），頁350。

⁵⁰ 王伯顏，〈我國國際貿易之危機及統制政策〉，《民族雜誌》，卷2，號3（1934年），頁2。

⁵¹ 〈中國農產物貿易問題〉，《國際貿易導報》，卷6，號8（1934年8月），頁178。

⁵² 馬寅初，前引文，頁9。

外出口額下降，即可引起進口貿易值的低減。此表示中國購買力的低落，實則為國內生產衰落的表徵。⁵³ 加以洋貨所至，即發生土貨滯銷的危機，洋貨乃可取代或補充國貨之不足。

正是在洋貨可取代或補充國貨之不足的同一前提之下，馬克斯主義論者承接了貿易論者前述的論點，強調在危機表現的基本形態上，中國經濟危機具有生產不足危機與生產過剩危機相結合的特性。但是他們強調生產不足危機是由農業經濟中仍然存在的封建農業經濟型態所決定的，而生產過剩危機，則是由於中國經濟已被捲入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帝國主義剩餘農產品在中國傾銷所形成的。所謂封建農業經濟所存在的生產不足危機，係由土地所有與土地使用之間的矛盾關係造成，本文擬於下節論述。而資本主義經濟所具有的基本矛盾，原是在於高度的社會生產力與有限的購買力不能配合，從而表現生產過剩的危機。中國之所以出現此生產過剩的危機，則是源自於前述帝國主義經濟危機對中國之轉嫁，因而具有濃厚的半殖民性質。堪為馬克斯史觀派代表人物的經濟史家陳翰笙說：

「就連中國的富農，如今也在縮減他們的耕地面積以及他們的勞動力。……他們擔不起那種幾乎肯定會由變幻莫測的經濟和政治形勢引起的種種風險。他們也經不住日益增加的進口農產品的衝擊。……凡是研究過中國情況的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幾乎都在那裡發現了大量的封建殘餘，但是只有極少數學者沒有忽視中國的政治經濟中那種複雜的殖民地性質，這種殖民地性質實際上比其他任何因素更加有助於加強目前封建關係的韌性，甚至強度。——中國農民不但正在受封建主義之害，而且也在受資本主義之害，不但正在受中國生產不足之害，也在受國外生產過剩危機之害。此外，他們還像殖民地人民那樣正在外國的統治下受苦。」⁵⁴

由此可知，中國內含於世界經濟體系之中而成為帝國主義的一個特殊的壓榨對象，只是助長帝國主義投資的侵略效果，並強化了中國原有的封建性，卻不

⁵³ 朱偰，〈農村經濟沒落原因之分析及救濟農民生計之對策〉，《東方雜誌》，卷32，號1（1935年1月），頁30。

⁵⁴ 陳翰笙，《解放前的地主與農民——華南農村危機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頁10-11。

能在互惠的關係下，使資源由中國傳統的農業部門大量流向現代產業部門，以促進產業的成長，以致於造成中國半殖民半封建並存的現象，這正是中國同時遭受生產不足之害與生產過剩之害的根源。

中國同時遭受生產不足之害與生產過剩之害，也正顯示，馬克斯主義論者以為，三〇年代中國面臨的經濟危機具有從封建經濟危機逐步過渡到與資本主義危機交織的特點。中國近代經濟是在承襲封建社會後期極其落後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的基礎上延續下來。然而，資本帝國主義的入侵，便以中國作為國際資本商品傾銷市場，當其大量的傾銷與中國日益萎縮的經濟以及與人民產生尖銳的衝突，中國也就逐步從封建性的經濟危機過渡到資本主義性質的危機的階段上，因而有封建經濟危機與資本主義危機交織的特點。⁵⁵ 在二十世紀三〇年代之前，由於中國承受的資本主義國家傾銷的農產品數量尚小，因此在此之前中國的經濟危機，主要是封建性的。進入三〇年代之後，各資本主義國家為轉嫁危機的禍害，從此對中國進行剩餘產品傾銷的數量越來越大，中國經濟就出現封建性危機與資本主義性質危機交織的局面。馬克斯主義論者正是從這樣的觀點觀察中外經濟關係的特徵的。李紫翔的說法頗具代表性，他以為三〇年代以前中國經歷的封建性危機是一種慢性恐慌，其後發生的急性恐慌，表現著資本主義危機的特質，則是建立在封建性的慢性危機的基礎之上。他說：

「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後，在帝國主義侵略與封建殘餘勢力束縛之下，中國國民經濟，特別是農業手工業陷於一種不可挽救的慢性恐慌之慘境。……此次急性的經濟恐慌之爆發，固然受了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恐慌之嚴重影響，特別是帝國主義者之恐慌挽救運動中轉嫁負擔於半殖民地之影響。但是無疑的實是中國經濟之慢性恐慌的必然結果。換句話說，這次急性恐慌是爆發於慢性的基礎之上的。」⁵⁶

⁵⁵ Arif Dirlik, *Revolution &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p. 74–79.

⁵⁶ 李紫翔，〈中國經濟恐慌之觀察〉，《中國經濟恐慌與經濟改造》（上海：中華書局，1935年），12。

2.不均衡說

貨幣論者強調白銀存量的多寡是決定中國經濟安定與否的關鍵因素。他們根據國際經濟均衡原理立論，^⑦ 認為一國的國民經濟必須和國際經濟獲得調和，而通貨供給的多寡，就是使國民經濟和國際經濟調和的主要橋樑。他們認為要使通貨供給的多寡能夠發揮安定和發展國民經濟的作用，必須國民經濟中財貨和貨幣雙方數量上獲得均衡，使貨幣的對內購買力（物價）與對外購買力（匯價）自動調節，如此才能求得對外貿易和貨幣收支均衡的自動調節，以及國民經濟和世界經濟的實質均衡。因此，一國的對外匯率和國際收支的平衡與否，成為判定國內經濟和國際經濟是否維持均勢關係的指標。^⑧ 貨幣論者據此認定 1931 年底中國經濟陷入恐慌，是中國國民經濟與國際經濟由均衡關係走向不均衡關係的開始。在他們看來，1929 至 1931 年間，白銀進口與入超增加、物價上升諸現象儘管同時發生，但由於新增加之入超與進口之銀貨總計，等於國際收支上因銀供給增加、銀價跌價後所發生順差之數額，故國內外經濟仍可恢復適當均衡。^⑨ 不過，1931 年以後，銀價高漲，中國的國民經濟遂由幣值的高騰問題，一變而為匯價與銀價的脫節問題，再進而為白銀的外流問題，通貨收縮一發不可收拾，銀價起落不能隨中國經濟起伏。中國對外均衡關係破壞，國際收支趨於失衡。

1931 年後中國對外經濟關係受到多方面之干擾。首先是源自英、日、美之放棄金本位。英、美、日放棄金本位影響於中國經濟者，非僅單純的引起金

⑦ 顧季高，〈中國新貨幣改革與國際經濟均衡〉，即引用國際經濟均衡原理分析中國經濟恐慌成因的典型例子。在人類經濟史上，每當發生經濟紛擾，便有各種對立解釋出現，其中貨幣因素論總是自成一說，與生產、成本或工資等見解相對立。貨幣因素論的主張大要為通過一國國內通貨之緊密聯繫於那依存於國際金流動，國際金分配的金本位幣，而使一國經濟能和國際經濟密切配合，不斷地循環自動調節。他們的推論過程是，金的流出流入，自動地矯正了這一國通貨量的過多或過少，從而可以阻止通貨價值的過大變動；同時且可調節其國內利率的高低與對外貿易對外收支的順逆。參考林鐘雄，〈唯貨幣論者與非貨幣論者〉，《當代貨幣理論與政策》（台北：三民書局，1981 年），第五章；林葭蕃，〈貨幣學原理〉（台北：作者自印，1980 年），頁 153-154。

⑧ 1930 年代的中國的貨幣因素論者則認為適於金本位制的國際經濟均衡原理亦可用之於銀本位國，見顧季高，〈中國新貨幣改革與國際經濟均衡〉，頁 381。

⑨ 顧季高，〈中國之新貨幣政策與國際經濟均衡〉，《抗戰前貨幣史資料》（台北：國史館，1988 年），第三冊，頁 383。

銀比價的變動，此外尚有放棄金本位各國匯價的變遷及其國內物價之趨向，在在均可能波及中國之經濟。余捷瓊即曾言及 1931 年後銀價漲高遠較一般物價為速，銀在放棄金本位國市場中對於貨物的購買力高漲，中國的對外貿易即開始受到不良影響。他說：

「試以英國放棄金本位為例說明。英國放棄金本位後，金鎊計算之銀價，雖已漲高，金銀計算之銀價，則仍低落，中國對英匯價已脫離金銀比價而下跌。假定英國放棄金本位以後，物價的上漲與銀價保持同一程度，則英國雖放棄金本位，而物價與銀價的變動對於中國的影響可以調和，中國不致感受不利的影響。但據余捷瓊稱，「英國放棄金本位後，國內物價雖微有上升，而其變動甚微，加以銀貨為一有獨立市場的貨物，其對英鎊的價格，決於世界市價。」^⑩

另外，趙蘭坪認為，英、日、美貨幣及大多數國家貶低幣值對中國經濟之干擾，簡言之，即匯價翻騰。但他同時強調，中國此時期所受匯兌傾銷之壓迫，與金本位集團各國是相同的。他說：

「1932年以來，英、美、日本以及大多數國家之減低幣值，貶低匯價。吾國對於此等國家之匯價，反比例而騰貴，輸出貿易，因此而不振，國內產業，因此而萎縮，吾國所受匯價傾銷之壓迫，正與金本位各國相同。」^⑪

張素民亦稱，九一八以來，國幣對英、日的匯價上漲，1934年以後，國幣對美的匯價亦上漲，於是「銀幣的價值被動的提高，物價被動的壓低」，中國對外關係趨向不利。^⑫

顯然，上述各貨幣論者以為，1934年以前，中國的對外關係，單純的只是一個幣值高漲的問題。在這個時期，匯價雖高，但匯價與貨幣購買力的平價尚未有脫節的現象發生，匯價平價仍甚吻合，且其影響似僅只及於中國的國際收支，中國的幣值物價仍有與世界的幣值、物價建立新的均衡關係的可能。張素民即有這樣的看法，他說：

⑩ 余捷瓊，〈中國之新貨幣政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頁13。

⑪ 趙蘭坪，〈幣制改革與金融安定〉，《抗戰前貨幣史資料》，第三冊，頁477。

⑫ 張素民，〈幣制改革之意義及其影響〉，《抗戰前貨幣史資料》，第一冊，頁284。

「各國的幣制政策，若只此而止，則各國的幣價安定之後，國幣因世界銀價之降落，對外匯價，也可稍低，我們的幣價、物價，可以調節，而與世界的幣價、物價，建立在一個新的平衡上。」⁶³

余捷瓊亦稱：

「各國貶低幣值後，銀價漲高較速，但銀既為一般普通貨物之一，遲早亦當與其他物價回復均衡。」⁶⁴

換言之，在1934年以前，中國既為唯一的用銀國，銀價最終亦當決定於中國的國際收支，中國因匯價過高致收支不利，世界銀價最後亦當滑落。

其次，1934年後中國對外經濟關係之受干擾，與美國之購銀政策，息息相關。前述中國對外經濟因匯價變動而受干擾，唯中國對此對外匯價之反騰，僅以幣值減低、匯價下落之國家為限，對於其他金本位集團之各國，並無影響。然而，1934年美國實施購銀政策之後，中國匯價之騰貴，實源於銀價之上漲，且此危機之形成為中國所獨有，而為其他金本位各國所無，故其影響，對中國而言，為普遍的、深刻的，中國對於各貿易對手國，皆無例外的遭逢匯價騰貴的問題。銀價起落自此不再隨中國經濟而起伏，中國對外經濟關係不再恢復均衡，貨幣論者的論點，可分數項說明如下：

首先是銀價物價匯價的差數不斷擴大。蓋美國既實行購銀政策，中國銀本位的維持，根本發生動搖。銀本位的動搖，一方面使外人資金流出，國內資金向外逃避，投機者趁機活動，於是匯價、銀價與物價的脫節，完全不能避免，銀貨的外流愈速，信用恐慌愈不可收拾。余捷瓊說：

「銀匯與銀價發生脫節，白銀乃大量流出。中國的短期信用市場完備，則短期資金大量流入中國，銀匯與銀價之差，可藉短期資金的流動以恢復調整。但中國情形不同，銀匯銀價脫節的根本原因，既在於一般人對銀本位信心的墮落，且中國並非國際的金融中心，短期資金的流入，根本無此可能，於是銀價與銀匯的脫落，逐日擴大，除運銀出口外，別無他法。」⁶⁵

⁶³ 同前註。

⁶⁴ 余捷瓊，前引書，頁16。

⁶⁵ 同上，頁18。

他並且認為，大量流出之現銀，不只使國內資金或國際資金大量外流，因投資收益減少，同時也是由於中國幣值不但不因銀貨的運出而提高，且因商人普遍有所期待，不願將外匯出售，或加價出售，而反使銀匯低落，銀匯銀價的差數，更因此而擴大。^⑯張素民亦論及1934年以後，中國經濟恐慌之所以益形嚴重，實為美國提高銀價，中國匯價更貴的結果。這是因為中國對外匯價普遍的上升，致中國對外輸出更為困難，輸入貿易更為容易。國內產業，所受壓迫，更趨嚴重。他說：

「去年（1933年）對法匯價，平均五百十三法郎，而在今年五月，亦竟漲至六百二十二法郎，……，吾經濟恐慌，必更嚴重。……。出口貨在外國市場之售價，更被抬高，而在國內市價，則更壓低。進口貨，在中國市場之售價，更可減低，國產貨物，則不得不再減價競售。一般物價，必更因此而下落，購買能力，亦必較前減退。」^⑰

顯然，銀價再騰貴自然使貿易收支愈為支绌，一般物價愈為下跌。

再者，銀價、匯價、物價的差數不斷擴大，亦使中國國際收支自動均衡的機制喪失。自1934年美國購銀運動實施以來，由於中國對用金諸國之匯率起落無定，銀價不隨中國經濟之變動以起伏，而隨美國之經濟政策以為起落，致國際均衡作用賴以建立之自由放任的基礎，已然完全喪失。國民經濟中財貨與貨幣雙方數量既不能維持均衡，致本國貨幣購買力與國內物價、成本、收入諸結構均行調整的機能，不復得見。物價、銀價、匯價的脫節，遂進而破壞了中國對外貿易和國際收支的自動調節作用。顧季高言及美國購銀政策與中國國際收支失衡的關聯，有謂：

「數年來在銀本位制下我國物價及國際收支是否平衡，均操諸美國政府。苟美國對銀價不用人力抬高，則……中國在海外為銀之邊際購買者，可以決定銀價，不致國際物價與國內物價失調，而使國際收支發生逆差。若美國抬高銀價，則我國物價高過國際水平，對外收支即發生逆差。」^⑱

^⑯ 同註^⑮。

^⑰ 張素民，前引文，頁258。

^⑱ 顧季高，〈中國的新貨幣政策與國際經濟均衡〉，頁393。

余捷瓊也論及 1934 年美國的實施購銀政策，勢將為銀貨開闢一新的出路，從而減低中國國際收支對於世界銀價的決定力量，使中國對外均衡的恢復完全不可能實現。他說：

「假如美國只有放棄金本位而不購銀，則銀在美國市場中對於貨物購買力的變動，究有一定限制。中國雖已感受不利的影響，但其程度當可較小。惟美國放棄金本位之後，再繼之以推行購銀政策，銀價與物價的變動的差度迅速擴大，在此情形之下，即使中國盡力收縮信用，削減成本，亦不能使均衡回復。」^{⑥9}

總之，貨幣論者的認識與主張可大致歸納如下：中國雖為用銀的國家，但本身並無銀的出產，在世界銀價的變動過程中，中國的國際收支僅為一個不重要的因子，中國對於銀價不但全無操縱之力，相反的，中國的匯價反隨世界銀價的變動而變動，國際收支則隨匯價而變化，反居於被動的地位，中國經濟遂完全在不能控制的因子的支配之下，難有恢復國際均衡關係的可能。

五、城市經濟與鄉村經濟關係的認知

1. 生產消費失調說

貿易論者不只強調生產過剩危機與生產不足危機的結合為中國經濟危機形成的特徵，同時也強調國內經濟根本上由於生產消費之失調，以至於與中國對外經濟一樣也面對生產相對過剩的局面。生產消費之所以失衡，他們以為原因不在物價的跌落，而在物價失其平衡。而物價之所以不均，則由於 1930 年代銀匯跌落後，進口物價劇烈上升，未能使國內物價普遍上揚，引起國內相對物價之變動。又由於相對物價的變動，引發財富生產方向之變動，從而演成國內生產相對過剩的局面。谷春帆即稱，1930、1931 年間銀匯跌落後，國內物價平衡關係破裂，進口品、工藝品、消費品價格不斷上漲，而原料品、農產品價格始終下跌。原料品農產品價格與消費品價格高低相差頗鉅。他說：

「1930 年銀匯之跌落，雖使進口物價劇烈上升，並未使國內物價相當上升。物價間之差異，遂成致命之傷。盲目之生產，更使經濟平衡破壞。」

^{⑥9} 余捷瓊，前引書，頁 15-6。

……如銀價、銀匯再跌，進口物價再漲，國內工藝品之價格亦隨之而漲，則其與農產品價格之差異，亦必愈大。」^⑩

他又論及工業製成品、消費品價格上漲，原料品價格下降，致生產製成品，消費品，有利可圖，產量增加，以及農產品物價跌落，購買力低跌，從而造成了產業界生產過剩，致演成消費品供過於求的現象。他並且認為消費品、工業品的供過於求，埋下了此後經濟恐慌的因子。他說：

「不幸當時雖因一時工藝品價格之上漲，原料品價格之低廉，以為有利可圖，胡亂增加本產。而內地社會之消費力，則正因工藝品物價之上漲，農產品物價之跌落，而大受斲喪。故從最初以來，工業生產之增加，先已缺乏相當銷場。故 1930 下半年及 1931 上半年表面上生產界之繁榮，乃無根之花，……一經經濟上政治上之風暴，繁榮頓變為恐慌。」^⑪

此種物價不均而非物價下跌為導致經濟衰沈之遠因的推論，獲得《申報》時論上署名「仁」的作者的支持。他也認為造成中國經濟危機，部分原因除由於外貨之傾銷外，部分原因則由於原料價格下跌，廠商大量生產，以致造成生產過剩，正為產業危機之淵藪。^⑫ 顯見財富生產方向發生變動，致生產相對之過剩，應為經濟衰沈期間國內經濟的特徵之一。此種經濟特徵的形成，說明匯價傾銷不只使國內的生產不足危機遭逢國外的生產過剩危機，同時也使國內經濟危機除生產不足的問題之外，又面臨局部地區或生產部門之生產相對過剩的問題。

此生產過剩危機並決定了國內城鄉之間經濟恐慌發展的走向。生產過剩經濟危機的形成，首先見諸於上述財富生產方向的變動，繼之引發財富分配狀況的改變，而其結果則使農業社會之購買力愈形下降。這是因為原料品價格與消費品價格高低相距既已日形擴大，在工業品物價之相對上漲，農產品物價相對跌落的前提下，農人所得農產品價格，愈趨減少，使農民購買力大受斲喪。谷春帆曾提及 1931 年後財富分配之狀況有愈發不利於農民的趨勢。

^⑩ 谷春帆，前引書，頁 131。

^⑪ 谷春帆，前引書，頁 125。

^⑫ 《申報》，1935 年 5 月 29 日。

他說：

「自 1927 至 1929 年，……成製品與原料品價格之變動不遠。售賣農產之所，可以換得相當之成製品。1930 年起，情形大變。成製品價格猝然比上上升百分之十七，比之農產品平均高出百分之二十。自此以後，原料品大大跌價，而成製品售價則比較堅挺。……估計農人之購買力從 1930 年至 1931 年減少約百分之三十，從 1931 年至 1933 年，又減少百分之三十。……」⁷³

在他看來，物價相對跌落之程度，即表示農業社會購買力減少之程度。

但是正因為工業方面多用土產原料製造消費品，因此，與農村受害的情況相反的是，在 1934 年以前的經濟蕭條期間，城市工業反能日益發展，所得益增。劉大鈞指出，由於「輸出原料品指數跌落，而輸入消費品之市價仍然很高，工廠成本低，而產品能賣高價，當然可以獲利」。所以，在一般物價跌落的過程中，上海工業反能日益發展。⁷⁴ 工業原料品價格與消費品價格跌落之不均，正說明了城鄉之間的財富分配有趨於兩極化的發展態勢。

由此可見，由匯價、物價相對變動不均，引起全國財產分配趨勢的變化，對農民是造成極為不利的影響。此一結果，同樣可由貿易入超對全國財產分配趨勢的影響得知。這是因為貿易的入超不只使國內總購買力趨於減少，且在總購買力減少之後，財富又重行分配，致使剩餘之總購買力在消費及生產各階段間重行分配，而其結果，一如上述物價相對變動的結果，顯然也不利於農民。究其理由，谷春帆以為可由貿易入超對農民之影響窺知一二。他說：

「洋貨入超增加若干，即國產品之總購買力減少若干。然以我國內地人民生活費之低，及每人所攤輸出入貿易額之少測知，則於短時期內入超之數增加一倍以上，其關於一般人民之購買力絕非小事。且喪失購買力最甚者，尤以農民為多。因中國之出口多屬農產，而農產之價格跌落又最巨。」⁷⁵

貿易論者以為，城鄉財富增減不同的趨勢，在 1934 年底因為銀外流，銀

⁷³ 谷春帆，前引書，頁 124—5。

⁷⁴ 劉大鈞，〈近八年我國物價的研究〉，《東方雜誌》，卷 31，號 16（1934 年），頁 13。

⁷⁵ 谷春帆，前引書，頁 124。

錢業自救不遑，致工廠停工，商店停業，失業職工日有增加，而使城市與農村同樣面臨產業崩潰、經濟蕭條的困境。如朱偰即曾提及上海市面凋敝的景象，有使產業崩潰愈趨擴大的趨勢，他說：

「上海華洋銀行庫存現銀由（1934年5月）569,356,000元減至（1935年5月）335,081,000元；最近一週間，又少65萬3千元，鑿自美國二次提高銀價以後，白銀又不斷外流，……，信用恐慌瀰漫各處。於是申新七廠倒閉，銀錢業自救不遑，上海一地工廠停工作者，據其三；商店停業者十居其四，失業職工，日有增加；可統計者數達七十餘萬。」^⑯

貿易論者以為，輸出入物價間的差異頗大，為國內物價失衡的淵藪，亦為城鄉間財富分配不均的發展關鍵。馬克斯主義論者亦有同樣的看法。他們以為國內物價之失衡，不只反映著中外農工產品間的不等價交換，同樣也意味著城鄉間的交易具有不等價交換的本質。他們指出，國內工、農產品間剪刀差價的日益擴大，是城市商業資本對農民進行加深盤剝的重要表現；同時，他們也強調，肆意剝削農民的商業資本的重大來源，是城市中的外國商業資本和中國買辦或官僚資本。李紫翔即曾提及，城市外國商業資本和中國官僚、買辦商業資本所表現的殖民性和封建性，是向農民大量傾銷各種商品及減價收購農民的產品，他們從不等價交換中對農民的剝削是與日俱增的。他說：

「中國的農村一方面既永久持續著入超，一方面又受工農產品交換價格差的損失，農村的現金不得不流入通商口岸，最後更流至帝國主義的國家。……那些以農村經濟破產為前提而發達起來的近代大都市——「通商口岸」，又能夠維持畸形和腐朽的繁榮。許多詫異著，……農村破產與少數大都市的畸形發展；一般人民生活程度降低至動物的水準，與統治階級的無限制的榨取和帝國主義者額外利潤的繼續搜括，同時並存。」^⑰

顯然，帝國主義榨取去的金錢，雖是全中國的損失，但最後必轉為農村的負擔。

⑯ 朱偰，〈世界通貨戰爭之現階段及中國應取之對策〉，《東方雜誌》，卷32，號13（1935年7），頁40。

⑰ 李紫翔，〈中國經濟恐慌之觀察〉，《中國經濟恐慌與經濟改造》（上海：中華書局，1935年），頁50。

根據上述，馬克斯主義論者顯然認為，城鄉不等價關係的建立，同樣表現現著帝國主義擴張的本質。因為發揮此一城鄉不等價關係的剝削功能的是買辦和官僚商業資本。他們既係附著於該帝國主義殖民地性質下的封建經濟構造，並以農村經濟的破產為前提，而成就近代通商口岸「畸形和腐朽的繁榮」，則城鄉之間的交換關係，必然也表現著帝國主義擴張之不平等交易的本質。隨著帝國主義擴張式的剝削與傾銷，乃使城鄉關係愈趨對立，農村所得物價與所付物價愈趨背離。李紫翔曾描述這樣的過程，他說：

「中國的農業生產者不僅要負擔一般資本主義國家之工業品與農產品之交換價格差的損失，並且因輸出輸入商品，均為各帝國主義銀行、洋行，以及為其所操縱的中國買辦商業機關獨占之下，輸入的洋貨，每在世界市場價格之上，而輸出的土貨，則又在世界市場價格之下，壟斷中國市場價格，攫取特殊買辦利潤，從而更增大了工農產品——洋土貨之價格剪刀式的差額。」⁷⁸

陳翰笙顯然是同意這樣的觀點的。因為他也認為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擴張，係透過地主和買辦階級，在中國內地建立一高利貸資本，或商業資本網絡，然後再通過他們與中國此一經濟體系銜接起來。這除可確保中國的財貨將以利於資本主義國家的方式流向資本主義國家之外，並保證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及其在中國社會所佔的優勢。⁷⁹這或者說明帝國主義對中國之剝削，其性質相近於城市商業資本對農村的剝削。

2. 物價成本脫節說

相對於貿易論者主張生產消費失調說，貨幣論者主張中國經濟危機產生的根源在於物價與成本的脫節。貨幣論者認為一國國民經濟的均衡與不均衡，必須在世界經濟中獲得矯正，才能達到真正的均衡。因此，他們也同時認為一

⁷⁸ 李紫翔，〈拉西曼報告書之農業部分的批評〉，《中國鄉村建設批判》（上海：生活書店，1936年3月），頁74。

⁷⁹ 根據個人對陳翰笙的研究，發現他亦有相同的觀點。他認為資本主義經濟體之擴張，係透過地主和買辦階級，在中國內地建立一高利貸資本，或商業資本網絡，然後再通過他們與中國此一經濟體系銜接起來。他說：「中國買辦、官僚和地方士紳已經成為帝國主義對中國經濟滲透的良好媒介。……只有通過這一媒介，外國貨幣資本才能夠達到中國腹地。」見李宇平，〈試論陳翰笙有關中國農村貧窮化論點的形成〉，《師大歷史學報》，第廿一期（1993年6月），頁186。陳翰笙引文，見陳翰笙，《陳翰笙文集》，頁118-9。

國之本國貨幣與國際貨幣未能連結，將使其對外匯率與國際經濟均衡的自動調節機能失其功效，以致使其本國國民經濟中財貨與貨幣雙方數量未能調節。而貨幣與財貨雙方數量未能調節，勢將導致其本國之貨幣購買力未能與國內物價、成本、收入諸結構均行調整等現象。所以，顧季高認為中國數年來人為的通貨緊縮，造成中國貨幣對內購買力之下跌，破壞了中國物價與成本的平衡關係：

「在一均衡的貨幣狀況下，物價與成本適為相等，各業之發展或衰退，不受貨幣因素之擾亂，而領取各項收入者，得以保持適當衡平之關係。

……中國過去數年人為的通貨緊縮下的特徵，不僅在物價之下跌，而在一般物價下跌之遠逾一般成本之下跌，在一般物價中，出口品、原材料品、農產品之下跌，遠過進口品及製成品之下跌。」^⑩

物價與成本脫節之表現，主要為物價跌落程度之不均。諸如原材料與製成品間價格差異之顯著、製造品中消費品價格之跌落遠甚於生產品等。成本與物價之所以失調，原材料與製成品價格差異之所以顯著，原因在於原材料之需要不如製成品之需要有伸縮性，是以物價雖低，需求並無顯著之增加，價格乃不斷下跌。加以原料生產在國際市場中自由競爭，原材料價格直接受其影響，自難維持一定價格。而製成品成本之一大部分，俱屬性質較為固定之工資、利息、運輸費用，不能隨物價之跌落而有同比例之低減。有此諸種原因，原材料價格之跌落，乃遠遠超過製成品之上。^⑪ 余捷瓊因此認為，各種產業在恐慌期間地位之消長，「當視其成本與所得的變遷而定」。^⑫

依據方才英的觀察，恐慌期間各類物價變動情形大體反映了上述成本與價格的變動關係。他以 1934 年與 1935 年原材料及製造品之價格跌幅作比較，1935 年的原材料跌落程度較劇，與 1934 年的跌幅平均相較，原材料下跌百分之十，製造品則跌落百分之八。此外，如將製造品分為生產、消費品二大類，價格跌降之比較，1935 年的價格降跌以消費品為鉅，較 1934 年下跌百分之九，

⑩ 顧季高，〈中國之新貨幣政策與國際經濟均衡〉，頁 395。

⑪ 參考喬智千，〈物價跌落之不均及其影響〉，《中央銀行月報》，卷 3，號 1（1934 年 1 月），頁 35-35。

⑫ 余捷瓊，前引書，頁 40。

而生產品下跌則僅百分之五。^⑧ 他再比較 1934、1933 年之消費品與生產品價格，則消費品指數跌降較鉅，計 1934 年較 1933 年同期下跌百分之一三・三，生產品則僅下跌百分之八・九。^⑨ 顧季高顯然同意這樣的觀察足以反映實情，故說：「原料品及農產品下跌在先，程度亦重，工業品在後且程度亦輕。」^⑩ 此類觀察除透露各類商品物價之變動，均趨跌勢之外，同時也顯示各類商品價格跌降之比較，乃是原料品甚於製造品；消費品甚於生產品；農產品甚於其他原料品。凡此均反映了成本與物價的失調。

農產原料品價格之降低，亦導致農民階層地位的降低。誠如前述，原料品之需要不如製成品之需要有彈性，致農產品率先跌落，且跌速最快，跌幅最深，使農民經濟大受影響。余捷瓊即曾論及在經濟危機中農民地位降低的過程。他以為，中國農業生產不能隨物價變動而自動發生調整的作用，加以世界經濟恐慌發生後，海外農產品物價的低落亦最為迅速。中國輸出以農產品為多，當然亦不免感受影響，因此國內農產物價之崩潰最速，占國內最大多數的農民的購買力亦衰減特甚。^⑪ 路易士與張履鸞亦提及此一現象說：「在物價跌落的時候，容易脫售而未加工製造之原料品的價格跌落最速，而且最易。農人所出售的產品，即屬此類，故其價格之跌落，亦最速。」^⑫ 農民所得日減，購買力益低，其經濟地位亦隨之降低。

另在城市方面，製造家的生產利潤亦逐日降低。余捷瓊認為在 1931 年以前，製造業售賣所得較成本為高，直接增加產業界的購買力與投資能力，對生產者、企業家較為有利。但在 1931 年以後，各類物價發生變動。製造品的價格較原料為高，也就是成本構造中原料成本相對減輕，產業界似處於有利的地位，但製造品的成本中，除原料之外，尚有工資、利率及資本物、成本

^⑧ 方才英，〈民國二十三年中國經濟之變遷〉，《大公報》，「經濟周刊」，1935 年 2 月 13 日。

^⑨ 方才英，〈中國年來物價慘跌之嚴重性及其原因〉，《大公報》，「經濟周刊」，1934 年 7 月 11 日。

^⑩ 顧季高，〈銀問題與中國物價問題〉，《中央日報》，1934 年 3 月 10 日。見《民國二〇—三〇年代中國經濟農業土地水利問題資料》（台北：成文出版社，1980 年），編號 74-C6-9。

^⑪ 余捷瓊，前引書，頁 38。

^⑫ 路易士、張履鸞，〈中國之經濟恐慌〉，第四篇，〈中國之農業恐慌〉，《銀行周報》，卷 19，號 41（1935 年），頁 11。

等，原料價格雖較宜，而其他成本，則變動甚少。故企業家的所得亦漸趨不利。⁸⁸ 路易士、張履鸞也認為製造業的營業量於 1930、1931 年共增漲百分之二十四，但在 1932 年物價開始跌落以後，因工資、債務、運費及都市中一切公用事業費等，在物價跌落時，仍不見更動，製造業原來營業量的大量增漲，在 1932 年後乃忽呈相反的趨勢。⁸⁹ 再者，產業界的收益減少，誠如余捷瓊所言，直接的結果就是投資額的減少，於是「原料過剩，失業工人增多，整個的購買力全受影響」。一般資本家鑑於投資的無利，於是將款項擱置或暫存銀行，「社會游資與銀行封存的資金同時增多，社會的購買力愈受影響」。⁹⁰ 凡此均說明物價低落時期，廠商不得不減低生產，產業界的收益因而減少。

在社會購買力減少的同時，各項商業，遭受經濟恐慌的侵襲，其營業總額減少，股本亦逐漸減少。路易士、張履鸞說，在物價下跌之際，批發買進、零售賣出的商人，很不得利。因為商人必須努力將貨物速速售出，以便再進價格較廉的新貨，且「這種情形，循環反覆，經過幾千遍之後，由於進貨出貨時間上的過程關係，商人不得不繼續蝕本。」⁹¹

物價與成本的脫節不止對製造業產生負面影響，連帶亦波及銀行業。由於工商業的負債項目，即係銀行家的資產項目，工商各業利潤減低，銀行經營由是相繼失敗。這是因為工商業無利可圖，致使失業及連帶發生之社會病態頻頻出現。而失業者多，又使此種情形更為惡化。貨幣價值增漲，與工商業之無利可圖，又使工商各業財產之價值更見跌落，證券的價格日見降低。工商業財產與債券為銀行的擔保品，其價值跌落至銀行不能忍受之程度，銀行乃易於倒閉。路易士、張履鸞說：

「物價跌落時，商人無利可圖，工商業的負債項目的價值即見低減。」

換句話說，就是商業組織欠銀行的債款不能歸還。工商業抵押於銀行的房地產，由於工商業本身的虧失，價值驟見跌落。就中國物價跌落的現象言，擔保品的價值當跌落到該產業在銀行方面所抵押的票面價

⁸⁸ 余捷瓊，前引書，頁 41-2。

⁸⁹ 路易士、張履鸞，〈中國之經濟恐慌〉，第五篇，〈中國之實業界恐慌〉，《銀行周報》，卷 19，號 42(1935 年)，頁 13、頁 15。

⁹⁰ 余捷瓊，前引書，頁 44。

⁹¹ 同註⁸⁹，頁 13-14。

值之下，在這種情形之下，抵押借款者縱使能歸還，亦每不願清理此種抵押之債務。……則銀行倒閉，乃可以認為係物價慘落之自然的與無法避免的結果。」⁹²

總之，貨幣論者認為，各類商品價格跌落的程度不同，各級生產者的所得物價與所付物價之極不平均，使經濟各部門的均衡遭到破壞的同時，蔓延於農村的經濟恐慌隨著產業間的連鎖效應，也擴展至城市。

六、經濟危機說的形成

本節將討論兩派學者形成上述各項認知的觀念基礎與思想淵源，並討論馬克斯主義論者對經濟危機形成原因的分析。

1. 貨幣論的經濟危機說

貨幣論者不認為經濟恐慌具有使社會各階層利益分離或衝突的力量。他們既認為付給農業勞動者的工資或收益，明顯的與廠商的製造品同樣受到市場價格的支配，並影響及城市工商業者及銀行家的利益，則農產物價格的下降與產業利潤的降低，就他們看來，顯然不再是地區性市場不景氣的反映，而是全國性市場失調的延伸。這說明，經濟恐慌是在全國性的市場上發展起來，經濟恐慌不但未與特定的社會階層的利害關係相連結，反為驅使各階層所得朝同方向變動的全國性要素。

由於市場的廣泛普及性與貨幣的普遍使用息息相關，貨幣論者鑒於經濟恐慌的危機時期均伴以金融信用事業的瓦解，且在經濟危機時期總是缺乏貨幣和資本，所以反對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說。他們以為若是各種物品同時生產過剩，則必非生產領域內的供求失衡，而是交換領域內的貨幣供給有了變動。顧季高因此從交換領域詮釋經濟危機的發展。他說：

「若說生產過剩是指全體生產品都過剩了，那我們實不能相信。因為真正的生產過剩，必定……都有餘裕，而現在呢？尚有無千無萬的啼飢號寒之人，可見此種生產過剩，只不過是對於有購買力的人的生產過剩。進一步講，多種物品的同時生產過剩，實不由於貨物之供給方

⁹² 同註⁹⁰，頁14-15。

面，而是由於貨幣方面有了變動所致。」^⑬

貨幣論者以交換論詮釋經濟危機的發展，認為經濟危機的成因是在金融信用事業之中，同時也是本於他們對中國現狀的認知。他們認為中國經濟已進入貨幣經濟的階段，物價的下跌並非導因於生產成本的變動，而是導因於金融深化後貨幣制度組織的作用，貨幣因素論者因而強調中國金融市場之變動為整個中國經濟蕭條之縮影。方才英說：

「欲知中國經濟之變遷，可分析（二十三年）我國金融市場之變動。蓋金融市場，實為整個經濟世界之縮小表現。吾人均稱現代之經濟組織為『貨幣經濟』（money economy），亦即『金融經濟』。因現代經濟活動，實不能脫離市場。故由金融市場之活動，可覘窺整個經濟之發展也。」^⑭

顧季高也以為，中國經濟已踏進了所謂「價格經濟」時代，故謂「經濟行為之輪轉，隨物價變動之程度與方向而轉變。一切生產原素之利用與分配，商情之興衰，整個社會福利，胥視物價而定」。^⑮

貨幣論者之視繁榮與蕭條之交替為一純粹的貨幣現象，與其服膺自亞當斯密（Adam Smith）以降以迄海耶克（Friedrich A. Hayek）之自由主義經濟傳統息息相關。他們之所以認為經濟恐慌源自貨幣數量、物價水準及國際收支間的互動關係的不均衡，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基於他們相信貨幣數量說在分析經濟現象上的有效性。因為根據貨幣數量說，認識到經濟紛擾主要係貨幣數量變動的結果。其二，基於貨幣數量說申論了貨幣數量與經濟規模變動的密切相關性。這可以說明顧季高、張素民等貨幣因素論者，何以時時稱引Ralph G. Hawtrey, Gottfried Haberler, T. E. Gregory, Lionel C. Robbins等自由經濟派學者的主張，^⑯力圖證明自動趨於均衡的學說在經濟實情分析上的有

⑬ 顧季高，〈世界經濟恐慌之原因及目前狀況〉，《銀行周報》，卷 19，號 21（1935 年），頁 2。

⑭ 才方英，〈民國二十三年中國經濟之變遷〉，《大公報》，「經濟周刊」，1935 年 2 月 13 日。

⑮ 轉引自朱炳南，〈國民經濟建設與物價水平〉，《東方雜誌》，卷 33，號 14（1936 年），頁 23。

⑯ 這些自由經濟派學者的傳承關係及其主張，見 Joseph A.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王作榮譯，《經濟分析史》（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8 年），卷 2。

效性。^⑦ 正是由於貨幣因素論者對自由競爭、自由放任、自動調節等經濟原則的信守，顧氏乃將經濟危機的形成，歸諸於錯誤的貨幣政策。由於此一人為措施的不當，造成對經濟均衡的破壞。他說：

「縱使四年前各國相繼減低平價以及兩年前美國抬高銀價，我國的經濟結構，必可適應調節，而不至如現在之竭蹶周章。蓋根據以上的理論，我們可以斷定，中國過去的病根是由於經濟的不平衡的發展，使得國民收入分配不合理。而經濟的不平行，則是由於積極的貨幣和經濟政策之故。」^⑧

總之，貨幣論者強調經濟恐慌源自各國貶低幣值及美國白銀政策，尤其是美國的白銀政策對國際收支自動調節機能的破壞，顯然有其論理背景。

2. 貿易論的經濟危機說

相對於貨幣論者之持通貨數量說為解釋經濟蕭條的因子，貿易論者則持生產消費失調的觀點。基本上，他們並不認為經濟危機為一純粹的貨幣現象，卻不否認貨幣因素與經濟蕭條，具某種程度的關連。貿易論者強調銀匯高低可影響國內物價與生產機制的觀念，由此可見端倪。貿易論者認為，引起繁榮走向蕭條的原因是消費品的生產過多，而原料品的生產相對不足，其形成的前提條件是貨幣資本短缺，同樣也是強調貨幣和放款的減少，在危機發展過程中的角色。如谷春帆即曾言及 1932 年後，中國投資活動後繼無力，乃因資本家將生產資源用於製造消費品的部分超過資本家願意提供的儲蓄，然而，儲蓄不足，實即意味著購買力的不足，故在需求不足的情況下，消費品因銷售無門而價格大跌，銀行放款率減退，廠商投資無利，一般大眾所得低減，需求全面下降，生產過剩的局面由是形成。^⑨ 這種危機的發生是由於生產資料和消費品相比，消費品有了過度的發展。也就是說，危機的產生是由於社會生

^⑦ 顧季高，〈中國新貨幣政策與國際經濟均衡〉，《抗戰前十年貨幣史資料》（台北：國史館，1988年），第三冊，頁380、頁399、頁413，均可見顧氏引用國際均衡原理分析中國經濟恐慌之形成。

^⑧ 顧季高，〈中國現在果需要一個不動的物價水平否？〉，《銀行周報》，卷20，號8（1936年），頁7。

^⑨ 谷春帆，〈物價與恐慌〉，《社會經濟月報》，卷2，期9（1935年），頁8-10。谷春帆，〈金融恐慌的原因與救濟辦法提要〉，《社會經濟月報》，卷2，號6（1935年），頁4-5。

產的兩大部類的比例，同貨幣數量在這二大部類之間的分配比例不能配合，造成消費品的生產過剩。谷春帆的說法，似是源自海耶克有關投資過度說的論點。^⑩ 谷春帆曾提及海耶克《物價與生產》(*Prices and Production*, 1931)一書有關貨幣物價變動對生產結構變動的影響，以及分析由此引起的整個經濟活動的波動，^⑪ 可見在經濟危機的認知方面，貿易論者企圖將三〇年代中國經濟恐慌的實質發展過程與海耶克的經濟周期學說，勉力予以整合。^⑫

但是，貿易論者的生產消費失調說與海耶克的經濟周期循環學說並不盡然相同。海耶克《物價與生產》一書所涉及的有關貨幣變動影響生產因素分配和產業興衰的論點，是著眼於景氣變動的周期循環，說明經濟繁榮與經濟蕭條交替輪迴的過程；實質因素論者所持生產失調說，由供給與需求的均衡與否，轉為農工產業部門間均衡條件的討論，更表現著他們自身對社會結構取向的分析偏好，並不一定顯示他們已意識到中國經濟變動本身是否已有與西方類似的周期循環的現象。^⑬ 貿易論者之所以強調農工產業分工的差別，正顯示他們已注意及城鄉產消結構分化的差別。生產與消費不純粹只是生產過程中兩大部門的反映，同時也是結構不平衡的指標。農村具有生產的功能，卻不具消費的能力，城市因為獨佔了消費品的享用機能，從而使其消費機能相對於生產機能更形突出。程紹德因此以為，白銀大量流向城市，貨幣數量在城鄉之間分布的不均衡，正是由於工業生產用品及農業生產用品的消費多集中都市。他說：

「工業生產用品之製造及販賣者，多集中於都市。農業生產用品之出售者，復因生活之需要關係，亦復趨於都市。故此兩種所分得之富量，大都分向都市集中。因中國畸形經濟之發展，內地所有之過剩現金，及其

^⑩ F. K. Hayek, *Prices and Production*, 許大川譯，《物價與生產》（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6年）第一、二講。又見，方崇桂主編，《西方經濟理論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431—434。

^⑪ 谷春帆，〈物價與恐慌〉，《社會經濟月報》，卷2，期9(1935年9月)，頁7—8。

^⑫ 貿易論者的論點實則是說明中國經濟恐慌的成因是消費不足。他們認為生產過剩係變態的，實則生產能力不足。他們不過借用海耶克的投資過度說，宣揚其消費不足的論點。

^⑬ 有關西方經濟有周期循環的現象，可見杜岡——巴拉諾夫斯基著，《周期性工業危機》（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一篇，危機史。有關經濟周期循環理論的研究，可見G. Haberler著，許大川譯，《繁榮與蕭條》（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年）。

現金使用，復由小都市而集中於大都市。」^⑩

可知，農村為生產者，而大部分之消費者在大都市，造成的現金由內地集中於都市的現象，是由農村輸至城市的單向流通的交易行為所帶動的，並不是由城鄉間的雙向貿易所形成的。

農村與城市間單向流通的交易行為的普遍，說明城鄉之間絕少發生由生產性的投資所帶來的相互加強的發展，城鄉之間的溝通，多半建立在剝削推動的市場行為或謀利推動的商品化的基礎之上。程紹德曾述及，將農村的流動資金帶向都市，隨後又使這批資源流向國外的是數種不從事生產性投資的人物及其所扮演的角色有：「一知識分子，作消費的吸取；二貪官污吏，三土匪，四軍閥，五土豪劣紳等，作掠奪的吸取；六商人，作謀利的吸取。」^⑪其結果，造成「中國生產中心之農村經濟極其衰退，而消費中心之都市經濟，則極其摩登化」、「生產能力與消費能力相差過巨」的現象。^⑫張一凡因此指出，所謂生產力過剩說，實係變態的，實由於銷場之狹隘，而發生此種不自然之過剩。^⑬谷春帆也說，「生產相對過剩，……實在就是相對不足」。^⑭

經濟危機起自生產消費之不平衡，與通貨區域的分布息息相關。貿易論者以為，中國仍有相當部分是屬於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範疇，貨幣經濟並非支配物價漲落、經濟消長的唯一因素。張一凡反對路易士有關中國經濟的繁榮與蕭條完全繫於銀價漲落的論點，他認為影響中國物價水準高低的因素有國民購買力、各地成本結構的不同等，這包括政治、社會、天災水患等因素。^⑮顯然，他認為中國經濟的景氣或不景氣，仍受局部地區特殊狀況的影響。谷春帆亦以為，中國大部分地區尚在經濟發展初期，銀價漲落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只限於與對外貿易相關的產業或地區，與對外貿易並無直接關聯的非貨幣經濟區域，無以反應世界經濟變動，與世界經濟同其興衰消長者實

^⑩ 程紹德，〈從世界經濟的恐慌談到中國農村經濟的崩潰〉，《時代公論》，第68號（1933年），頁18—9。張一帆亦有雷同的看法，見〈白銀問題與中國〉，《中國經濟》，卷2，期4（1934年），頁6—7。

^⑪ 程紹德，〈從世界經濟的恐慌談到中國農村經濟的崩潰〉，頁6。

^⑫ 同前註。

^⑬ 張一帆，〈中國產業金融的出路〉，《申報》，1935年10月28日，版15。

^⑭ 谷春帆，〈物價與恐慌〉，頁10。

^⑮ 張一凡，〈白銀問題與中國〉，頁6—7。

在少見。他說：

「中國大部分地方尚在經濟發展之初期，多少含有自給自足之意，大部分產品（尤以糧食為然）均消費於產地，並不運出市場銷售。故銀價漲落，對於此等生產之增減，殆無密切之關係。產品不在國際貿易範圍內者，其所受銀價上落之影響，並無直接關係。」^⑩

貿易論者因此強調中國經濟之衰落不能完全視為世界經濟衰落之一部分。中國經濟恐慌之形成，內在的、非經濟的、區域性的因素，此等發展中國家所受到的各種障礙和約束限制，仍占極端重要的角色。馬寅初因此以中國經濟衰落與世界各國之不景氣，性質截然不同。他說：

「現在世界各國之不景氣，其嚴重性卻與中國經濟衰落相等，但二者在性質上根本不同也。歐美所謂不景氣，因生產過剩，而引起之產業停滯，物價跌落，利潤消減，……於是工廠關閉，工人失業，……若夫中國根本上無生產過剩問題之發生。一個飢寒交迫之國家，何從談到過剩，所以中國之經濟衰落，不能視為世界經濟恐慌。」^⑪

強調中國經濟全面性的蕭條有源自於內在自發性的因素所使然者，說明中國經濟由於本身不易變動，致使中國整體經濟經常處於持續的不平衡的狀態中。這種不平衡的狀態，表現為某些部門中供過於求，某些部門求過於供，這意味著許多東西的供需都是缺乏彈性的。因此，為了更好的調整經濟，實質因素論者不主張追究市場機能的作用，而主張著重於了解國民經濟中生產部門結構和貿易結構，因為這些是了解經濟興衰消長過程的線索。

3.馬克斯主義論的經濟危機說

馬克斯主義論者反對交易論的經濟危機說。他們以為貨幣和放款資本的缺乏，並非經濟危機形成的原因，而是經濟危機的結果，是資本主義生產結構的基本矛盾之表現，且只有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才會發生。張仲寔說：

「在資本主義社會裡，經濟危機時期感覺需要貨幣和放款者，並非是因為一般貨幣太少，而是因為經濟危機時期所顯露的生產過剩，迫使一切資本家『保守』現款，『驅逐』貨品之故。所以貨幣和放款的減少，

^⑩ 谷春帆，前引書，頁110。

^⑪ 馬寅初，〈中國經濟改造之中心問題〉，《西北文化月報》，1936年2月10日，版6。

……是產生經濟危機的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基本矛盾之表現。」^⑪

馬克斯主義論者也反對消費論的經濟危機說。他們認為經濟危機的發生不是源自生產消費的失調，也不是民眾消費的不足。他們認為民眾消費不足是任何建立於剝削行為之上的社會制度之必要前提，也是資本主義社會形成的必要前提。由於馬克斯主義論者認定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是引起經濟危機產生的必要條件，所以他們只是指出群眾消費不足是經濟危機形成的條件之一，且在經濟危機發展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但並未說明經濟危機發生的真正原因。如王崑崙即指出，消費生產間的不均衡，並未說明現在為什麼會發生經濟危機，以及以前為什麼沒有發生的原因。他說：

「我們知道，群眾消費之不足，在資本主義前期也是有的，此種事實，業已存在了好幾千年，在任何分成的社會中都是可以看到的。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不是存在於任何社會中，不是存在於任何分成階級的社會中，而只是存在於資本主義的社會中。」^⑫

馬克斯主義論者既以為危機發生的原因不在金融信託事業之中，又以為經濟危機發生的原因，不在生產消費間均衡的破壞。他們強調經濟危機的形成乃根源於生產方法的特殊矛盾，此即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不和諧。

馬克斯主義論者以為中國經濟危機之所以發生，不只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轉嫁，同時也因為面臨著封建農業經濟危機，從而在危機表現的基本形態上具有前文所述的生產不足危機與生產過剩危機結合的特性，並表現著半封建半殖民的特質。他們以為，中國之所以會發生土地所有與土地使用之間的矛盾，產生封建農業經濟危機，誠如陳翰笙所說，其理由在於農村問題既是中國社會問題的重心，土地調節機制因成中國社會系之支柱，他說：

「農村諸問題的中心是在那裡呢？它們是集中在土地之占有和利用，以及其他農業生產的手段上。從這些問題，產生了各種不同的農村生產關係，因而發生了各種不同的生產組織和社會意識。」^⑬

⑪ 張仲寔，〈資本主義底經濟危機論〉，《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1934年冬季號，頁572。

⑫ 王崑崙，〈世界經濟恐慌與中國殖民地化的現狀〉，《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1934年冬季號，頁601。

⑬ 陳翰笙，〈陳翰笙文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頁31。

但馬克斯論者同時也強調此一土地關係調節機制是生產體系中形成了分殊化的分工現象的結果。此一現象使得剩餘生產得以產生，並由一個少數人的集團所獨占。這些少數人由於與生產大眾處於一種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之中，於是農村社會的階級分化日益加劇，並掀起土地集中的新浪潮，農民破產的數量不斷增加，乃造成農業生產的下降或妨礙其發展，從而演成農業經濟危機。陳翰笙曾經論及農村社會階級分化的背景及其影響：

「是什麼情況造成農業生產的下降或妨礙它的發展呢？……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只能通過對農業生產中各種社會關係的考察才能加以說明。這些由自然條件造成的關係，不僅決定了經濟的、社會的和政治的環境，而且決定了農業生產的特殊性質和發展。它們包括生產者一方與另一方之間的關係。這另一方控制著土地、貸款、物質供應、勞動力價格、市場、以及省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各項政策。……在農村社會裡，……經濟作物隨之增長，農村社會階級分化日益加劇。基本的表現形式是產生了一個能夠將諸如族田之類公共世襲財產變成私人財產的新的剝削階級，另一方面，又產生了一個毫無地位甚至最後都無權過問那些行使權力者的所作所為的佃農階級。……這種新地主比那些屬於舊鄉紳的大地主勢力要大得多，因為他們現在可以直接憑藉武力收取他們的地租，……這種購置地產的活動，無論何時何地都在進行中，……土地價值以及隨之而來的地租普遍趨於上漲。于是就掀起了一個土地集中的新浪潮。……農民破產的數量在不斷增長。」^⑯

農民的逃亡不純粹表現中國農村的封建性經濟危機特徵，同時也是因為中國經濟恐慌同時具有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特徵。即城市中高度的社會生產力與勞、農大眾有限的購買力不能配合的問題。這一方面表現在農民的生產因剝削而減少收入，一方面則表現在農民的消費因剝削而增加支出，乃使農民的購買力愈形降低，資本家的收入不稍減少。孫懷仁曾指出這種特徵，他說：

「農村恐慌的二面性，……就是一方面農民的生活，因剝削而減少收入；另一方面農民的消費，卻因剝削而增加支出。……在這次恐慌當

^⑯ 陳翰笙，《解放前的地主與農民——華南農村危機研究》，頁8。

中，資本主義各國農產品價格，均有較工業品更猛烈的跌落。這價格跌落的中間，自然包括工業資本家對農民的剝削。而中國呢？除了這種剝削之外，還有外國農產品的傾銷的影響。別人用科學的大量的生產方法來和我們的中古時代的農業生產方法競爭。……再說第二面——消費方面的剝削。以工業品吸收農村人民的銀錢，本來是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取得營養的一種手段，……中國歷來在貿易上的入超就代表一部分被吸收去了的營養。……除了外國商品以貿易的方式施行剝削外，還有外人在華的工業和新興的民族工業，也一樣的以農村為他們商品的尾閭，所以在消費方面，中國農民所受的剝削，也是二重的。」¹¹

所以，經濟恐慌期間，農村所受打擊遠遠超過城市資本主義經濟，農民受到的剝削，實際則擴充了城市資本主義經濟。

由於外人在華工業、民族工業和新興資本家大多集中都市，城市與鄉村漸漸變成了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對立的具體化身。在前述帝國主義透過中國城市中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的幫助以推進工業資本，「中國買辦、官僚和地方士紳已經成為帝國主義對中國經濟滲透的良好媒介」，且「只有通過這一媒介，外國貨幣資本才能達到中國腹地」¹²的前提下，階級剝削已不可避免的形成這一土地生產關係與社會其他層面的主要聯繫，從而使得農民的生產手段有與其所控制之物質生產手段（生產資源與生產利潤）愈形分離的趨勢：分離於自己所製造的成品、分離於他們用以進行生產的工具。於是無地農民增加，直接造成農民的無產階級化。陳翰笙曾論及資本主義經濟手段之擴張及其對農民無產階級化的影響，他說：

「生產美種煙草的費用，也比種植穀物或豆類的費用高。……它意味著沒有中國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幫助，像『英美煙』這種形式的外國工業資本便不能夠深入到中國內地。……如此高昂的地租，加上所有隨之而來的各種負擔，壓在農民身上，並把他們驅逐到高利貸那裡。……穀物貸款的利息通常半年為百分之三十，……沒有人能想像，……有那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可能有這麼高的利率。破產的農民通過抵

11 〈由農村恐慌說到都市恐慌〉，《申報月刊》，卷3，號4（1934年），頁9—11。

12 陳翰笙，〈工業資本與中國農民〉，《陳翰笙文集》，頁118—9。

押過程迅速失掉他們的土地；由於不被工業接收或吸收的農民不斷增加，工資總的來說正在下降，各種形式的租金則在上升。這樣一來，破產現象便一再重演，並且加速這一過程，直到農民無產階級化。」¹¹¹

由此可知，馬克斯主義論者認為農民的無產階級化，固然係肇因於城市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擴大，但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擴大，同時也意味著帝國主義對中國經濟之剝削係建立於附從該帝國主義之社會經濟構造加強的基礎上。正由於中國的殖民地性質實際上有助於加強封建關係的韌性以及強度，隨著此一剝削關係的加深和擴大，使農民的生產活動的結果與其生產的原初目的（擁有生產資源與生產利潤）相矛盾，不免導致「破產的農民通過抵押過程迅速失掉他們的土地」。而此正是中國農村貧窮化的淵藪。所以，中國經濟危機形成的根源，正是農民喪失其對生產工具或資源（土地、勞力）的佔有的過程，這說明擁有生產力的農人和在其中運作的半封建和半殖民的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存在著衝突。

七、結 論

對於城鄉之間的互動關係，不論是貨幣論者的相成論，或貿易論者與馬克斯論者的相剋論，他們顯然都把整體經濟秩序看成是一雙重歷史的發展過程，其一是發生在社會自身的城鄉關係之內，其一是發生在附加其上的國際關係層次。三〇年代中國風起雲湧的中國經濟恐慌說，發端自對農村經濟蕭條的觀察與反省，終結為對西方列強或帝國主義對中國經濟衝擊的批評，一方面固然呈現了三〇年代論者有關「雙元經濟論」正反辯證的多元思考，同時也說明了當時人士對世界經濟擴張的質疑。對於持城鄉相剋論的貿易論或馬克斯論者而言，中國自遭受經濟恐慌侵襲以來，原本在經濟型態上即已存在的兩個不同體系共生並存的雙元結構，大體仍各自依循著獨立的道路發展，西方勢力的入侵儘管引進了附從於該體系的經濟結構，但其勢力，迄至 1930 年代，在中國的發展仍有其限制。它的作用既不那麼積極，又不那麼消極，且在很大程度上只侷限於通商口岸，而無法深入廣大的農村內地，這說明城市的

¹¹¹ 同上註，頁 110-111。

經濟結構，可能不同於農村的經濟結構，城市與農村在面對西力衝擊時，因此會引發不同幅度、不同方向的變化。城市的繁榮發展與農村的經濟蕭條可能同時發生，誠如本文正文所示，同時也是因為先進國家的生產擴張與落後國家的生產萎縮，會同時出現。這可以說明，在中外經濟的關係上，他們傾向於接納中國所扮演的「半殖民地」和「附屬國」的論點，他們認為帝國主義決不是帶來經濟發展，反而正是經濟不發展的根源。他們對先進社會在中國之擴張，抱持批判的態度，正因為他們認為發展是自主社會的內在過程，而非國際經濟體系分工的一環。

相對的，貨幣論者則認為城市經濟與農村經濟所受的西力衝擊可能是相同的，且以為西方影響所造就的城市與農村的興衰消長，可能同時發生。乃是因為他們認為，中國經濟的繁榮與蕭條，與世界經濟體系之「擴張」與「緊縮」的周期變動，桴鼓相應。他們認為西方列強來到中國，正是一個世界經濟體系形成與擴大的時期，帝國主義為長期停滯的中國經濟帶來了國際市場和發展世界體系的機會。世界經濟恐慌之所以產生，正因各國利益不同，使此一世界經濟體系面臨分崩瓦解的危機所致。

三〇年代論者對城鄉間關係及中國經濟與國際經濟關係的認知，相當決定了他們對中國經濟恐慌與世界經濟大恐慌之間的關懷性的若干判斷。貨幣論者之所以肯定各國貶低幣值，以及美國的購銀政策與中國經濟陷入全面蕭條的困境，極其相關，乃是因為他們以為中國的經濟蕭條，全然來自世界經濟大恐慌的衝擊。但是貿易論者及馬克斯主義論者，此項論點，本文已有論及。他們一方面反對世界經濟大恐慌對中國經濟具有全面性的影響，一方面又強調，由於農村經濟活動中自然經濟佔相當比例，非經濟性因素壟斷經濟活動，市場機能無法發展。內地各處的經濟蕭條源自天災、戰禍等因素，與世界經濟大恐慌的衝擊相關者，僅限部分農業商品化的地區。

衡諸當今經濟史家對三〇年代中國經濟變動的觀察，上述三〇年代言論界的若干論點，儘管與當年代經濟學界的觀察若合符節，但兩代之間對若干問題的看法，仍有見仁見智的差異。持貨幣論，並肯定三〇年代確曾發生市場危機者，無論是三〇年代的經濟學家或九〇年代當今的經濟史家如王業鍵、Milton Friedman，他們對中國經濟恐慌的成因與規模的看法並無出現重大的分

歧，大抵均同意三〇年代中國經濟全面性的蕭條，與世界經濟大恐慌間的密切關聯。^⑩但是強調經濟活動之變化先於貨幣數量之變化的實質因素論者，他們在兩代之間則出現分歧的見解。固然，他們皆反對世界經濟大恐慌對中國經濟具有全面性的影響，但對於中國經濟恐慌是否與市場之具有競爭性與整合性，則持迥然不同的論見。相對於三〇年代貿易論者的中國經濟全面蕭條說，當今的實質因素論者由於強調近代中國市場具高度競爭性及整合性，除承認部分天災及戰禍造成局部性的農村經濟蕭條外，並不認為中國經濟曾陷於全面蕭條的境地，也不認為世界經濟大恐慌曾經對中國經濟發生嚴重不幸的影響，竟至與西方發生同樣規模的世界經濟大恐慌。^⑪如馬若孟即認為，中國經濟儘管尚處於前近代階段，中國的生產和交換方式卻具有諸多的現代因素，如貨幣的廣泛使用，鼓勵生產者及商人進行合理選擇的法律行為和制度、可減少風險和不測而廣泛使用的契約、進出市場方便、賣主和買客眾多，以及商品規格區別很小等。^⑫因此，馬若孟以為近代中國市場具高度競爭性，國內區域經濟之整合早有高度之發展。所以，儘管中國不具抵抗西方經濟大恐慌衝擊的能力，卻可緩和世界經濟大恐慌對中國之威脅。^⑬又如 Loren Brandt 及 Thomas Sargent 以為物價水準之變動不獨受貨幣供求的影響，同時受國際間相對價格的影響。他們稱，1931年後，國際銀價上揚期間，相對於國際銀價之上揚，中國物價水準之降幅，實與國際銀價水準之漲幅維持同比例的、相反的變動關係。低物價水平使銀貨存量在較原有存量為小的水平上即可支撐真實餘額於不變。又因銀貨存量雖透過白銀輸出而下降，但在自由銀行機制下，

^⑩ 當今的貨幣史觀派史家有 Milton Friedman, "Franklin D. Roosevelt, Silver and Chin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0, No.1(1992). pp.71-93. Arthur Salter, *China and the Depression*, Chapter 2-4. Yeh-Chien Wang, "Economic Depression & China's Monetary Reform in 1935," 《香港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卷9，下冊（1978年），pp. 346-7.

^⑪ 貿易論的經濟史家及其代表作，分見 Loren Brandt & Thomas Sargent, "China & U.S. Silver Purchase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3 (1989), pp.34-45. Ramon Myers, "The World Depression & the Chinese Economy," p.169. Thomas Rawski, *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171-9.

^⑫ Ramon Myers, "Economic Structure and Growth," in Gilbert Rozman e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2), Chapter 4. pp.107-40.

^⑬ Ramon Myers, "The World Depression & the Chinese Economy," p.269.

銀行得發鈔以代銀幣。貨幣供求如此具有彈性，說明中國物價低迷與貨幣因素無關，而係源於單一物價法則，即中國物價水平受國際物價水平之影響，且國際物價間之支配作用遠勝於國內通貨因素的影響。唯亦正因國內通貨供需極具彈性，國際物價下跌對中國實質經濟之影響，乃可獲得緩和。^⑫ 換言之，他們都認為中國在同期間遭受物價低迷、通貨緊縮之影響遠較西方輕微。當代貿易論者的觀點儘管仍有值得商榷之處，但與三〇年代貿易論者的觀點相較，卻可能反映了三〇年代學者缺乏一種經濟落後並不意味經濟未有發展的認知。正由於缺乏此種認知，三〇年代的貿易論者儘管否認世界經濟大恐慌對中國經濟具全面性的衝擊，卻強調中國內地因經濟相對的停滯而陷入衰敗的局面，抱持較為悲觀的看法。^⑬

另外，當代學者有關白銀外流是否為抵補國際收支逆差之手段的爭議，迄今可說是仍存仁智之見，難有定論。當代學者鄭友揆在對白銀流動規律進行深入研究後，認為「白銀在國內及國外購買力在時間上和程度上的差異，這同其所引起的中國經濟膨脹及萎縮的影響，是導致白銀向中國流入或流出的主要原因」，因而「否定了白銀流動是抵消中國對外貿易的一個因素」。^⑭ 當今大陸學者王方中則徵引三〇年代千家駒等馬克斯主義學者的論著，力駁鄭友揆之說法不當，他說：

「把白銀外流僅僅看做是美國實施白銀政策這一個因素的後果是不妥當的。在明確了三〇年代嚴重的貿易入超是導致白銀外流的因素之後，就應該指出三〇年代的貿易入超與 1929–1933 年間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

^⑫ Loren Brandt & Thomas J. Sargent, "China & U.S. Silver Purchase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3(1989), pp. 34–5.

^⑬ 吳承明認為那種認為二〇年代和三〇年代中國經濟不斷陷於危機和蕭條的說法，「恐怕多數還過於悲觀的」，他認為從 1921 –1936 年，是中國資本主義範圍擴大的時期，或資本主義時期。他不否認三〇年代的經濟危機，但他強調它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周期性的危機。他認為三〇年代的經濟危機，主要還是市場危機，其特徵是購買力低落。在這期間，儘管有些產業，肯定是衰落的，但仍進行了技術改革和生產管理的改革，並擴充了市場需求，這說明，三〇年代經濟雖是蕭條的，但仍有些發展；市場機能儘管有些衰敗，但不全然是停滯的。《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頁 128–130。

^⑭ Yu-Kuei Cheng, op.cit., Chapter 5.

機、美國白銀政策一樣，也是使民族工業陷入深刻危機的因素。」^⑯本文則指出，王氏的結論可能仍只是因史料取材不同而形成的一家之言，難以視為一有效的推論。衡諸本文有關白銀外流與貿易或國際收支間因果關係，兩派學者的不同看法，大體而言，貿易論者認為貿易收支逆差為白銀外流的根本原因，故在救濟恐慌的政策主張上，多鼓吹改革關稅及收支逆差的根本原因，白銀外流並非用以彌補國際收支之逆差，故在救濟恐慌的政策上，他們多鼓吹白銀徵稅及幣制改革。^⑰若就 1935 年幣制改革成功，使經濟景氣的復甦，物價水準的上揚，^⑱白銀又重新流入^⑲此一事實而言，是否可以據此證明貿易論者的貿易收支逆差說較不具說服力，而幣制改革者所根據的通貨收縮論是正確的。換言之，三〇年代的白銀外流，不是王方中及貿易者所說彌補貿易收支之逆差，而是鄭友揆及貨幣論者所說的外資及華僑匯款的潛逃，^⑳從而造成 1932 年中國首度出現國際收支之逆差。貨幣論的觀察因經得起法幣改革的歷史事實的考驗，其觀點較為貼近史實的真相。

-
- ⑯ 王方中，〈1927-1937 年間的中國對外貿易〉，《近代中國》，輯 3（上海社會科學院，1993 年 5 月），頁 127-8。
- ⑰ 李宇平，〈恐慌之救濟與法幣政策的形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3，下冊（1994 年 6 月），頁 169-94。
- ⑱ 久保亨，〈幣制改革以降の中國經濟〉，見野澤豐編，《中國の幣制改革と國際關係》（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1 年），頁 96-108。
- ⑲ 《大美報》，1936 年 8 月 13 日，見《民國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國經濟農業土地水利問題資料》（1932-1950），編號 77-A1。
- ⑳ Yu-Kuei Cheng, op.cit., Chapter 5.

貨幣論者：

姓 名	籍 貢	學 歷	經 歷	著 作	出 处
何 廉 (字淬廉) 1885年生	湖南邵陽	耶魯大學 經濟學博士	南開大學教授 行政院政務處 處長 農本局總經理 經濟部次長 糧食管理局副 局長	《財政學》 《華北公共財政》	徐友春，《民 國人物大辭典 》，頁381。 劉紹唐主編， 《民國人物小 傳》第三冊， 頁
顧 翱 群 (字季高) 1900年生	江蘇淮安	紐約大學 工商管理碩士	財政部幣制委 員委員 中孚銀行滬行 副經理 行政院參事 廣東省財政廳 廳長	《危機時代的中西文 化》 《危機時代國際貨幣 金融論衡》	徐友春，《民 國人物大辭典 》，頁1677。
張素民	湖南長沙	佐治華盛頓 大學學士 威斯康辛大 學經濟學碩 士 本薛文尼亞 大學經濟學 博士	中央大學工商 管理系主任 光華大學經濟 系主任 滬江大學教授 暨南大學教授	《白銀問題與中國幣 制》 《價值論》 “The Marxian Theory of the state”	楊家駱編，《 民國人物圖鑑 》，頁
陳 長 舜 (字伯修) 1888年生	四川榮昌	哈佛大學政 治經濟學學 士、碩士	巴縣朝陽學院 經濟系教授兼 主任 財政部秘書 第一、二、三、 四屆立法委 員	《中國人口論》 《進化之真相》	徐友春，《民 國人物大辭典 》，頁1030。

貿易論者：

姓 名	籍 貨	學 歷	經 歷	著 作	出 處
谷 春 帆 (號春藩) 1900 年生	江蘇吳縣	上海聖芳濟書院	南陽縣郵局 局長 上海等地郵局 處長、副局長 上海市財政局 局長 郵政總局副局 長兼儲金匯業 局局長	《銀行變遷與中國》	徐友春，《民 國人物大辭典 》，頁 407。 李盛平，《中 國近現代人名 大辭典》，頁 321。
馬 寳 初 (名元善) 1882 年生	浙江嵊縣	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	北京大學文科 法科主任 興業銀行顧問 中國經濟學社 社長 浙江省主席 第一屆立法委 員	《通貨概論》 《通貨新論》 《國際貿易》	徐友春，《民 國人物大辭典 》，頁 684。
朱 傑 (字伯商) 1907 年生	浙江海鹽	柏林大學 經濟學博士	國立編譯館編 審 農復會專門委 員 中央大學教授	《行雲流水》 《中國財政問題》 《日本侵略滿蒙之研究》	楊家駱編，《 民國人物圖鑑 》。
劉 大 鈞 (字季陶， 號君謨) 1891 年生	江蘇丹徒	京師大學堂 密西根大學 學士	北京政府經濟 討論處調查主 任 漢治萍總公司 會計主任 立法院統計處 處長 國民政府統計 局局長 中國經濟學社 社長 中國統計學社 社長 軍事委員會 資源委員會委 員 軍事委員會國	《非常時期的貨幣問 題》 《工業化與中國的工 業建設》	

			民經濟研究所 所長 《國民經濟月 刊》主編		
程紹德 (字敬六) 1900年生	江蘇鹽城	留學法國 經濟學博士	《中央銀行月 報》、《經濟 匯報》主編 上海商學院教 授兼教務主任 重慶大學等校 教授 中央銀行專員	《論白銀問題》 《中外金融市場》	徐友春，《民 國人物大辭典 》，頁1150。
金國寶 (字侶琴) 1894年生	江蘇吳江	哥倫比亞大 學碩士	中國國民黨中 央黨務學校、 上海復旦大學 等校教授 南京市財政局 局長 交通銀行總稽 核 中央銀行會計 處處長	《中國幣制問題》 《統計新論》 《統計學大綱》 《高級統計學》 《工業統計學原 理》	徐友春，《民 國人物大辭典 》，頁489。
張一凡 (原名帆， 筆名華勝、 鄧洛夫、杜 洛甫、鮑樂 蒂) 1909年生	上海嘉定		《申報經濟專 刊》主編 《中外經濟萃 月刊》主編 環球信託銀行 、大同商業銀 行經理	《我國人口變動的 歷史根源》 《中國人口變遷史》 另編譯有《列強軍 縮外交戰鬥史》、 《財政金融大辭典》 、《中國與世界經 濟現勢》等書	

馬克斯主義論者：

姓 名	籍 賣	學 歷	經 歷	著 作	出 處
陳翰笙 1897年生	江蘇無錫	美芝加哥大 學碩士 德柏林大學 博士	北京大學教授 莫斯科國際農 村運動研究所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社 會科學研究所 所長	《工業資本與中國 農民》 《華南農村危機研 究》	《民國人物大 辭典》，頁 498。